

## 福建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的源流 及其與浙南地區的關係\*

郭素秋\*\*

本文爲了探討福建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及大量著黑陶的起源問題，針對這個時期的文化遺留進行縱時限和同時限的比較研究。在縱時限方面，進行這個時期與當地較早的曇石山文化，和繼庄邊山上層類型而興起的黃土侖類型之陶器比較；在同時限方面，則進行庄邊山上層類型與浙南地區的陶器比較。透過不同層面的交叉檢討的結果，筆者初步認爲包含彩陶在內的庄邊山上層類型的陶器組成，基本上可以在曇石山文化中找到類緣，換言之，庄邊山上層類型應爲在曇石山文化的傳統上發展而成的考古文化。另外，由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的胎質（主要介於軟陶和硬陶之間），和彩陶、著黑陶所使用的黑色顏料可能爲一種泥釉這些情形看來，均意味庄邊山上層類型的陶器處於從軟陶向原始瓷器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過渡階段。而隨著製陶技術的高度發展和真正的釉之出現，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和著黑陶也隨之消失不見或驟減。換言之，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和著黑陶等的出現，與曇石山文化製陶技術的發展有相當大的關聯；而隨著製陶技術的高度發展，和以幾何形紋飾爲表徵的考古文化之衰微，也導致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和著黑陶等的消失。

關鍵詞：庄邊山上層類型 彩陶 著黑陶 泥釉 製陶技術

---

\* 本文乃修改「臺灣的考古學研究」學術研討會之論文稿〈福建青銅時期彩陶的起源及其意義〉一文而成。（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12.9-10）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一、前言

福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曇石山文化消失之後，在同樣的閩江下游地區，出現了庄邊山上層類型，福建地區的彩陶即主要出現於這兩個時期。其中曇石山文化的彩陶，仍為零星且附屬性的存在；但是在其後出現的庄邊山上層類型中，彩陶不僅數量較多，且器形和紋飾均呈現較多樣化，並成為這個時期福建考古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郭素秋 2002：14-24）但是，閩江下游繼庄邊山上層類型之後而興起的黃土侖類型中，卻幾乎不見彩陶的出現。

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是指器表繪有黑（深）色彩紋的陶器，常與器表塗抹一層黑（深）色顏料的陶器（以下稱「著黑陶」）一起伴出，兩者的胎質以橙黃色陶為主，並有少量為灰色硬陶。這類遺存最初發現於閩侯曇石山遺址上層，由於當時所獲資料有限，曾一度將其歸於「曇石山文化」之中，致使其後不少研究者，在強調此類彩陶與臺灣西海岸發現的彩陶之類緣性時，竟作出曇石山文化與臺灣西海岸原始文化有密切關係的結論。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隨著閩侯白沙溪頭、榕岸庄邊山遺址等的發掘，從所獲得的考古資料中，有不少學者已經注意到，以黑色彩陶為主的這類遺存既有別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曇石山文化，也不同于閩江下游地區的青銅時代文化遺存——黃土侖類型，而是在年代上既介於兩者之間，並與兩者有所交迭的一種獨特的文化遺存，所以紛紛主張將此類遺存另立出來。（參見以下研究簡史部分）

但是，在愈來愈強烈地主張曇石山文化和庄邊山上層類型的文化性質完全不同的聲浪中，也使得庄邊山上層類型的起源成為一個新的問題。雖然有學者指出，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應起源於曇石山文化，但是這些學者也承認至今為止尚未發現令人信服的證據。所以在探討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起源問題之際，也同樣意味著不得不面臨庄邊山上層類型的起源問題。

由於這兩個問題的解決，對於福建，特別是閩江下游地區，如何結束新石器時代，而進入青銅時代的文化變遷之理解，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因此，本文嘗試以庄邊山上層類型中最具特色的彩陶和使用相同顏料的著黑陶做為切入點，並重視與之伴出的其它陶器，除了探討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的源流外，也藉以討論曇石山文化與庄邊山上層類型之間的文化關係。

本文另外一個欲探討的課題是，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為何到其後的黃土侖類型時期突然消失之因。有關這個問題，在福建學界目前尚未見到相關的議論，但是這個問題的探討，同樣對理解福建區域文化如何變遷這點，有著極大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而為了瞭解庄邊山上層類型時期，不同地區間彩陶的異同，本文並透過與浙南地區彩陶的比較，以瞭解兩地文化樣相和兩地可能的文化關係。

有關「庄邊山上層類型」這個命名，目前福建學者尚未達到一致的共識，其他亦有主張以「曇石山遺址上層」、「東張遺址中層」、「黃瓜山遺址」等為命名遺址或層位的建議，這些意見的分歧，主要與各遺址層位堆積是否單純，以及各遺址的發掘報告是否發表等有相當大的關係。終於在1998年，待望的庄邊山遺址之大規模發掘報告（福建省博物館 1998）發表，也使得主張以「庄邊山遺址上層」為這類遺存的命名者，有了強而有力的後盾。本文亦選擇以「庄邊山遺址上層」做為命名層位的理由，同樣在於庄邊山遺址經過大規模的科學發掘，而且上層的文化堆積最為單純且資料豐富，不同於曇石山遺址上層或黃瓜山遺址實際上包含了較晚的黃土侖類型等之要素，而東張遺址則至今仍僅有簡單的發掘報告。另外，稱之為「類型」則是強調其地域的特性。

## 二、相關研究回顧與研究方法

### （一）研究簡史

本節以與曇石山文化和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之相關研究簡史為主，透過這些調查發掘和相關研究的陳述，以做為理解本文研究的基礎。而為了清楚呈現遺址發掘和福建學界考古研究進展互動的狀況，以下將依年代順序進行敘述。

曇石山遺址位於閩侯縣荆溪鎮曇石村，長久以來被視為福建新石器晚期的重要遺址，和中國東南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代表。1954年1月7日，築閩江防洪堤的農民於曇石山南段取土時，發現了蛤蜊殼堆積層，和不少陶片、石器、陶紡輪等，進而受到矚目。為了通過試掘以瞭解遺物和地層的關係，及遺址的範圍，並利用試掘培養考古幹部，遂於1954年4月11至21日進行2條探溝的發掘，面積約30 m<sup>2</sup>，約占遺址總面積的2%。1955年，發表這次的發掘報告（華東文物工作隊福建組等 1955）。在這份報告中，作者林釗先生提到兩點認識：一是這個遺址只有新石器時代一個文化層；另一是2條探溝的堆積狀況基本上是相同的，它們的

文化層上層均受到後期擾亂，探溝底部都是斜坡形狀，所出土的遺物也大致相同，純蛤蜊層堆積層中均未出土遺物。在結論部分，可整理如下：曇石山遺址的陶器中，印紋陶占了主要部分，它和廣東的海豐、香港，浙江的良渚、老和山所出的印紋陶基本相同。但曇石山印紋陶有極少數質料用黃白色泥，燒得很硬，似瓷胎，陶器外表常附加泥條或鏈索紋凸飾，印紋陶表面又加上一層薄薄的赭色陶衣，這在其它遺址中很少見到。曇石山遺址中，繩紋陶和印紋陶並駕齊驅，繩紋陶外表和印紋陶一樣，也加有凸飾和赭色衣，還有不少的加劃紋，這是它處所少見的。曇石山出土的彩陶，和華北仰韶文化彩陶的作風也有所不同。至於黑陶雖和山東城子崖與浙江良渚近似，但曇石山陶器上，口沿有帶壓印圈點紋的，則不見於城子崖和良渚。（華東文物工作隊福建組等 1955：67-68）

1954年在進行考古調查之際，發現閩侯縣白沙溪頭遺址。（福建省博物館 1984b：459）

1957年1月，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進行全省文物普查的過程中，發現福清縣東張遺址。1958年初，福清縣因建設東張水庫，遂於3月28日至6月15日在東張遺址乙區（東半部較低部分）、甲區（西半部較高部分）進行搶救發掘。在1959年的報告中指出，東張遺址的彩陶片和閩侯曇石山、廈門灌口發現的相似，但不像華北彩陶的彩繪技術那樣精緻，應該是華北彩陶傳至福建的一種變體。（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 1959：111-112, 119, 122）而1965年的報告，更指出彩陶乃泥質陶胎，表面加黑色彩繪，胎有灰青色和橙黃色兩種，其中灰青色胎的彩陶火候高，質硬，表面磨光後加彩，紋飾為由直線組成的幾何形圖案，多數口沿內外均有彩繪；橙黃色胎的彩陶一般火候較低，質鬆，表面易於剝落，多在方格紋上加幾何形彩繪。（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1965：60）

1958年在福建東北部的考古學調查，於壽寧武曲鄉面前山，霞浦牙城鄉后山村浮山頭，福安穆陽鎮桂林村后山，周寧城關西門外山、浦源山、后門山，羅源中房鄉等地發現遺址，且都不同程度地發現了以黑彩為主的彩陶。（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1959；林聿亮 1990：90）

1958年發現廈門市灌口臨石寨山遺址，當時並採集8件的彩陶破片。其中1件彩陶破片為繩紋敞口廣腹圈底彩陶罐，器表呈灰紅色，而於口頸處繪有黑色斜人字形彩紋，罐內繪有黑色彩紋，陶質堅硬，火候較高；另1件為繪有黑色斜人字形彩紋的敞口圈底盆，表面呈灰紅色，無印紋。（林聿亮 1990：90-91）

1959年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發表〈福建考古工作概況〉一文，其中提到閩



侯曇石山遺址是以印紋陶為特徵的新石器文化遺存，還出現少量的彩陶和黑陶。文中並提到東張遺址作了比較全面的發掘，從文化層堆積的情形看，東張遺址似有三層不同包含物，其中上層出土銅器、釉陶、砂陶與印紋硬陶；中層出土少量彩陶、砂陶、印紋硬陶；下層出土砂陶與泥質軟陶、印紋硬陶。（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1959：619）

1959年呂榮芳先生指出，曇石山遺址、東張遺址是以印紋陶為主體的地方文化，而且這些印紋陶是從下層到上層逐漸發展而成的。但他強調這兩個遺址所代表的文化系統發展過程，並不是孤立的，因為有變體的彩陶和黑陶的出現。其中彩陶的質硬，紋飾簡單，是仰韶文化彩陶傳至南方的一種變體；而曇石山出土的黑陶色淡，不似龍山文化黑陶的光滑。無論是彩陶或黑陶，出土數量均極少，但它們表示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曾傳至東南地區，而且居次要地位，此也說明了印紋陶這一文化系統與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的相互關係。呂先生並從福建各遺址中大量印紋陶的堆積、器形種類的繁多、大量印紋陶的發現這幾個現象，進而指出印紋陶應該是起源於福建，其後才向周邊地區傳播。呂先生也強調只孤立地把印紋陶代表一種文化，而不和同一遺址中出土的遺物、層位關係及整個遺址一起討論，這樣必然會發生年代上的混亂，是不妥當的。（呂榮芳 1959：45-46, 49）但是，呂榮芳先生此時所指的印紋陶乃是包括繩、條、籃印紋等在內的陶器，而非全為現今所謂的幾何形印紋陶。

1959年12月23日至1960年1月5日進行曇石山遺址第2次發掘，1960年3月17至24日進行第3次發掘，1960年7月間又進行第4次發掘。這幾次的發掘簡報於1961年發表（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 1961），此報告主要的結論可整理如下：

1. 曇石山遺址出土的印紋陶、砂陶、彩陶、輪製磨光陶等，與附近的榕岸庄邊山、白沙溪頭巷、福州浮村遺址下層、福清東張遺址的陶器極為類似，可能是共同的文化系統。
2. 從文化層出土的遺物觀察，上層出土印紋硬陶多，下層漸少。一般堆積層的底部以橙黃色砂陶和輪製磨光陶占多數，而T105蛤蜊殼層之下又壓著一個灰坑，出土物僅有橙黃色砂陶和輪製磨光陶。這些可能說明居住此地的人們有前後延續的關係。
3. 下層所出輪製磨光陶的器物比較完整，有圈足鏤孔的盤、豆、碗、杯和罐等，其形制作風和浙江良渚的同形式陶器相似，兩者之間有一定的聯繫。

4. 彩陶出土數量極少，繪法比較粗糙，紋飾基本上沿用印紋陶的花紋，製作技術和華北彩陶完全不同，它只能說是一種在手製印紋陶器基礎上的彩飾作法，表現了本地製陶技術上的一個特點。
5. 曇石山遺址所出陶器形式複雜多樣，除了少部分磨光陶系為輪製外，大量的泥質和砂質印紋陶都是手製的，輪製僅用在口沿部分。印紋陶的外表比較普遍地塗上一層赭色衣，這是一個較突出的特點，火候也相當高。泥質灰色硬陶質量之高，幾乎可與東漢、六朝的青瓷相比。

庄邊山遺址為1956年文物普查中發現。1960年春，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曾組織人員對庄邊山遺址進行試掘，於庄邊山遺址首次出土戰國時代的墓葬，並確定庄邊山遺址為福建省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重要遺址之一。1961年經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第一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之一。（福建省博物館 1998：171）

1963年，曾昭燏、尹煥章兩位先生在〈江蘇古代歷史上的兩個問題〉這一文章中指出：

長江中、下游以南各省區，普遍發現了以幾何印紋硬陶為主的文化，它起源於東南沿海地區，而它的主要內容為：1. 以幾何印紋陶為主；2. 以有段石鐮為代表。福建曇石山遺址的內涵，正與此相符，加上它是首次經過科學發掘的遺址，故應把以幾何印紋陶為主的文化稱為曇石山文化。（曾昭燏、尹煥章 1963）

這是曇石山文化一名的最早由來，也是學者們對曇石山文化涵義的最初闡釋，但並未為日後學者所沿用。

1963年9月10至26日進行曇石山遺址的第5次發掘，僅開4×2.5m<sup>2</sup>的探坑，位於遺址的東南邊緣上。這次的發掘簡報於1964年發表（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廈門大學考古實習隊 1964）。此次雖然嘗試釐清層位和遺物間的關係，但是由於出土遺物太少，而無法進行下、上兩層的比較。

1965年，張其海和呂榮芳兩位先生根據曇石山遺址的第1至5次的發掘資料，探討各層的陶器器形的變化。他們根據層位中陶器種類的差異，將曇石山遺址分為上層和下層兩個層位。其中上層為貝塚，陶器主要為印紋硬陶系，包括橙黃色泥質印紋硬陶和灰褐色泥質印紋硬陶，並有少量的彩陶。兩位先生並指出上層這些彩陶是在幾何印紋硬陶的基礎上，沿襲印紋硬陶的紋飾而加以發展起來的。而下層並非為貝塚，陶器主要為泥質磨光陶系和夾砂印紋陶系。（張其海、呂榮芳 1965：193-195）。兩位先生雖將曇石山遺址分為上下兩層，但認為兩者代表同

一文化的早晚兩期。

1964年9月11日至1965年8月5日進行曇石山遺址第6次發掘，發掘地點是第1至5次發掘地點的南部邊緣地帶。此次發掘，從共計513m<sup>2</sup>的發掘面積中，出土32座墓葬、59個灰坑、2個火塘等。基本上釐清層位堆積的關係，對認識曇石山遺址的文化性質和年代等問題，有著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出土多量的陪葬品，透過地層的堆積關係，可以掌握器形的變化。1976年福建博物館發表此次的發掘報告，主要的結論可整理如下：（福建省博物館 1976：114-117）

1. 在層位方面，下、中、上三層的遺物是有區別的，下層以細砂紅陶為主，占30.17%；中層以粗砂繩紋灰陶為主，占41.82%；上層以幾何印紋硬陶為主，占52.63%。在器形方面，從三層中的陶容器有相同和相異的地方，說明了它們之間有因襲和演變的關係。
2. 三層的彩陶製作技術和式樣也不盡相同，下層的彩繪技術較差，容易剝落，中層和上層則無剝落現象，而且上層中的彩陶器都是硬陶製作，有的繪回形紋，可能是受了銅器花紋的影響。在顏色方面，下、中層用紅彩，上層則多用黑彩。
3. 在幾何印紋硬陶方面，下層僅發現13片，占0.33%；中層128片，占1.69%；上層2,891片，占52.63%。在下層墓葬未見幾何印紋硬陶，中層僅第4號墓葬（M4）出土1件。這種幾何印紋硬陶，在曇石山遺址中是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4. 三層中所有出土的陶器和石器，不論質地、形式和製作技術等方面，基本特徵是一致的，應為持續發展起來的文化。
5. 從第6次發掘和過去出土的遺物看來，石器以石鐮為最多，並以粗磨器身和刃部為其特徵。精磨石器很少，而且器身都很細小。陶器以圓底和圈足為特色。炊具以陶釜最具代表性。彩陶的花紋，多為條紋，圖案簡單，獨具風格。
6. 中層的兩件長牡蠣經碳十四年代測定，分別為3,090±90b.p.、3,005±90b.p.。
7. 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一處遺址和曇石山遺址相同的，因此我們認為它是一種具有濃厚地方性的文化遺存，或可命名為「曇石山文化」，以示與其它文化類型有所區別。

這是福建學者對曇石山文化的新定義，也為日後的學者所接受。

1974年10月24日至12月26日進行曇石山遺址第7次發掘，並於1983年發表發掘報告，主要的看法可整理如下：（陳存洗、陳龍 1983：21；福建省博物館 1983：1083-1084）

1. 曇石山遺址上層的陶器，是以幾何印紋陶（常見的紋飾有回紋、雲雷紋、方格紋）為主要特徵。其陶器的作風，受中原青銅文化的強烈影響，因此上層的文化性質，當不屬於新石器時代文化。在閩江下游有福清東張、閩侯懷安、庄邊山、黃土侖，以及福州的浮村遺址等，在閩南、閩北等地也都有發現，分布範圍很廣，應是這一廣泛地區的一種青銅時代文化。
2. 中層是曇石山遺址的主要堆積，與閩侯白沙溪頭、福清東張遺址下層、閩侯庄邊山遺址下層等均屬同一文化類型，分布範圍局限於閩江下游一帶。
3. 所謂幾何印紋硬陶，應是指火候較高、陶質堅硬、器表拍印各種幾何形紋樣的陶器。而陶質較軟，以拍印繩、籃紋為主的橙黃陶不能認為是幾何印紋硬陶，其不僅在紋飾上有別於幾何印紋陶，而且在陶質、火候、器物作風上也和幾何印紋陶根本不同。在這次發掘的下層遺物中，不見幾何印紋硬陶，在曇石山遺址歷次發掘的墓葬中也沒有發現過幾何印紋硬陶。而在閩侯白沙溪頭遺址出土的墓葬隨葬陶器，屬於曇石山文化類型的陶器中，也不見印紋硬陶。這就有力地說明，幾何印紋陶並非曇石山文化的一個特點。因此，我們認為，過去發表的考古發掘報告中提出「在下層發現十三片幾何印紋硬陶」的說法，似不可靠，以這種不可靠的材料作依據，說明曇石山遺址幾何印紋陶從少到多的論點也是值得商榷的。
4. 曇石山遺址所出土的遺物，由於具有獨特的「文化相」，不少學者已將它稱為「曇石山文化」，我們贊同這一文化的定名。但是，所謂曇石山文化，不應籠統地包括曇石山遺址上中下三層，因為上層不屬於新石器文化的範疇。當然也不應把上中下三層看成為同一文化的三個發展階段，至少目前還沒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證據。從文化面貌看，曇石山上層的幾何印紋陶和中下層的文化遺存，是截然不同的。

1975年12月9日至1976年1月3日，福建省博物館配合廈門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學生的考古實習，進行閩侯溪頭遺址的第1次發掘。（福建省博物館 1980：289）

1979年10月中旬至1980年1月底，進行閩侯溪頭遺址的第2次發掘。此次發掘總面積近1,300m<sup>2</sup>，基本上釐清了溪頭遺址的文化內涵。溪頭遺址是福建繼曇石山遺址發掘之後，第二個經過全面發掘的新石器時代遺址。1984年發表此次的發

掘報告，文中指出：以橙黃色陶和彩陶為主要文化特徵的東張中層類型，可能是閩江下游地區位於新石器時代向青銅時期過渡的一種文化遺存。（福建省博物館 1984b：459-460）

1981年牟永抗先生提到在浙南的甌江流域，遺址分布在沿江大山前的小山頂，而以瑞安縣飛雲江和永嘉縣上塘溪的兩岸最為密集，常見一種帶條印紋的黃灰色薄胎硬陶（有的內外兩面塗成黑色）和印紋陶共存。牟先生並指出，這個地區的文化面貌與浙江其它地區並不相同，卻與福建省閩江下游的文化遺留頗為接近。（牟永抗 1981a）

1981年王振鏞先生指出，把曇石山下層類型和中層類型遺存所反映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稱作「曇石山文化」，是符合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和慣例的。這兩個類型不但在墓葬有共同特點，而且在陶器方面也有不少共同特徵，反映了兩者間的繼承發展關係。其中施紅色陶衣的灰胎砂陶，是下層類型陶器的特徵之一，這在中層類型裏較少見。但中層類型有少量陶器施紅彩，紋樣多為極簡單的卵點紋、條紋、寬帶紋等。這些紅衣和紅彩的顏色相似，都容易剝落。紅陶衣是刷上去的，紅彩也是刷繪而成的，但後者省工簡便，效果卻更美觀。所以，中層的紅彩可能正是由下層的紅陶衣演化而來的。這些相近的特點說明，曇石山下層類型和曇石山中層類型同屬於曇石山文化，是曇石山文化前後兩個階段的文化遺存。至於曇石山上層，係貝丘之上的堆積，其內涵十分龐雜，有橙黃陶和硬質彩陶，也有灰色和紫灰色的幾何形印紋硬陶，甚至還有原始瓷等。無論陶系、器形和紋飾，都同曇石山中層有明顯差別，年代也較晚，延續時間較長，是青銅時代遺存，顯然不屬於曇石山文化範疇。（王振鏞 1981：66-67）

1981年吳綿吉先生檢視曇石山遺址的資料，提出墓葬分期的一些疑問，並根據陪葬品進行重新分期，以曇石山遺址為主軸，分為曇石山早期、中期前半、中期後半、晚期前半、晚期後半、黃土侖等時期。吳先生並提到曇石山遺址晚期的遺物相當複雜，乃為長期間堆積而成者。他並批評將曇石山遺址下層至上層均視為曇石山文化這種看法，而強調進一步研究的重要性。（吳綿吉 1981）

文革中，部分村民在庄邊山遺址北部擅自取土，破壞面積達800m<sup>2</sup>以上，致使北段形成了高約10m的斷崖，並造成大片文化堆積層逐年崩陷。為了不使遺址繼續破壞，1982年報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對庄邊山遺址進行搶救性發掘。發掘工作分1982年10月至1983年2月、1983年10月至1984年1月兩階段進行，發掘面積達2,804m<sup>2</sup>，是福建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掘面積最大的遺址。此次大規模的發掘資料

於1998年發表，報告中主要的結論可整理如下：（福建省博物館 1998：215-217）

1. 曇石山文化的年代，根據閩江下游區域內諸遺存的考古編年，及參照溪頭下層晚期灰坑出土陶片的熱釋光年代 $4,240 \pm 190 \text{b.p.}$ 和 $4,310 \pm 190 \text{b.p.}$ ，其下限應不晚於距今4,000年。曇石山文化早期的某些因素，如紅衣陶、紅泥磨光陶及貝齒紋、戳印紋等，曾見於殼丘頭文化遺存中，因而推測其上限年代亦大體與殼丘頭文化相銜接，約距今5,500年左右。曇石山文化的空間分布，應在閩江下游及東部沿海一帶，而福建西、北部內陸地區從牛鼻山文化遺存可以看出，其與曇石山文化差異較大，應屬於兩個不同的文化類型。
2. 以庄邊山上層為代表的遺存，較集中於閩東地區（福建東北部）和閩江下游一帶。而以幾何線條組成彩繪圖案，並以此作為陶器紋飾特徵的文化因素，卻在廣泛的區域內發現，北部可達浙江東南的甌江流域，南抵閩南沿海地帶，西近武夷山脈北段東翼地區，東部隔海相望的臺灣鳳鼻頭等遺址中也有類似的發現。反映了此類遺存的分布區域或文化影響面較曇石山文化更廣泛得多。庄邊山上層文化遺存的年代，其上限大體可與曇石山文化晚期銜接，即不早於距今4,000年。下限參照晚於此的黃土侖遺存木炭的測定年代 $3,470 \pm 220 \text{b.p.}$ ，可推測亦不晚於距今3,500年。

1986年福建省市聯合組成的考古隊，於九龍江流域的華安縣進行全面調查的結果，全縣共發現29處遺址，大部分的陶器為印紋陶，陶質以灰色硬陶為主，有的是施赭色衣的橙黃色陶，還有紅褐色砂陶等。（陳存洗 1989：93）

1987年於福建閩東地區的文物普查中，在福安酒廠后山、霞浦的柏洋、壽寧鳳陽嚇蘆岔對面山等地，發現了單純的彩陶遺址，這類遺址裏，發現的石器都非常小，以細小石片、石器為主。相反地，在一些發現有印紋硬陶的遺址（包括彩陶與硬陶混出的遺址）裏，常有較大型的石器等伴存，尤以一種花崗岩料製成的有肩石鐮為典型。這說明福建地區（尤以東北部為典型）的彩陶文化很可能是屬於單獨的文化發展階段。（福建省博物館 1989：10）但是由於各遺址詳細的資料並未發表，彩陶和伴存遺物的實際情形，無法進行檢證。

1987年王振鏞先生指出，曇石山上層既出土有庄邊山上層、東張中層的文化因素，又有黃土侖文化的因素，甚至有東張上層以伴出原始瓷為特徵的文化因素。這三種文化因素可能代表了三個不同時期的文化類型，大致反映了福建青銅文化的發展序列。而在白沙溪頭上層和黃土侖遺址，卻未發現彩陶。這說明這些



含有彩陶遺存的年代，應為晚於曇石山文化、而早於黃土侖類型的地方性文化類型。（王振鏞 1987；楊式挺 1990：46）

1987年吳綿吉先生根據新的資料和多數學者的看法，提出下述的觀點。曇石山文化指的是分布在閩江下游地區，以曇石山遺址下、中層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它並包括溪頭、庄邊山遺址的下文化層，東張遺址下文化層也與之有密切的關係。至於曇石山遺址的上層，內涵比較複雜，其基本內涵是以幾何印紋硬陶為主的，與曇石山下、中層相比，顯然是屬於性質完全不同的遺存，不應包含在曇石山文化之中，而是同東南地區「以幾何印紋硬陶為主的文化」一樣，屬於青銅時代的文化遺存。但是又有明顯的自己特點，它以灰色和橙黃色的幾何印紋硬陶為主，並與少量彩陶共存，這是具有濃厚地方色彩的早期幾何印紋硬陶遺存，同其它地區的「以幾何印紋硬陶為主的文化」，是不能等同起來的。（吳綿吉 1987：34-35）

1987年福建省全省文物普查中新發現黃瓜山遺址，1989年對黃瓜山遺址進行發掘，為福建東北部地區第一個發掘的遺址，1994年發表此次的發掘成果（福建省博物館 1994）。1990年福建學者林公務先生指出黃瓜山遺址的發掘，不僅豐富了對橙黃陶、施衣陶和彩繪陶器這一類文化遺存的內容之理解，而且也進一步並充分肯定了以黃瓜山、曇石山上層、庄邊山上層、東張中層為主要內涵的這類文化遺存，既有別於福建沿海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曇石山文化，也不同于閩江下游地區的青銅時代的黃土侖類型，而是在年代上既介於兩者之間，並與兩者有所交迭的一種獨特的文化遺存。這類遺存在東北部地區的分布最為普遍，幾乎東北部地區所有縣、市均有發現；其次，再遠而言之，南可達廈門沿海，北抵浙南甌江流域，西近武夷山脈，東隔臺灣海峽與臺灣西海岸的鳳鼻頭、圓山諸遺址也發生密切聯繫。如果把這個大範圍畫個圓圈，很顯然地，黃瓜山遺址正處於這個圓圈的中心位置。（林公務 1990a：28）

1990年林聿亮先生發表〈閩台彩陶文化略論〉一文，認為曇石山遺址上層的彩陶質地多為硬陶，有的繪有回形彩紋或雷形彩紋，可能受到青銅器紋飾的影響。（林聿亮 1990：89）

1993年吳春明先生發表〈粵閩台沿海的彩陶及相關問題〉一文，文中指出在閩江下游地區，可看出彩陶文化產生、發展一脈相承的軌跡。庄邊山上層等的彩陶圖案是發展過程中的幾何形紋，曇石山文化出現的寬帶紋、卵點紋、鉤形紋、豎條紋等，庄邊山上層等繼承曇石山文化這些圖案內容，並使線的平行、交叉組

合更加多樣化。從彩繪著色看來，曇石山文化的彩紋為紅彩、赭紅彩，工藝較差，彩色容易剝蝕；至庄邊山上層等仍有少量赭紅彩，但許多彩繪和陶衣介於赭紅與黑褐之間，可以看出這一地區彩繪顏色從鮮紅向暗褐逐漸演化的現象。庄邊山上層的彩繪比較牢固和不易剝蝕，是工藝發展的表現。與曇石山文化和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共存的陶器群之一脈相承發展關係更加明顯，都以圈底器、圈足器為特點，基本上不見三足器和袋類器，代表性的共存器物如寬沿釜、直頸罐、豆、杯等的陶質、陶色、拍印紋樣和器形的演變過程也是明確的。因此，閩江下游新石器時代彩陶遺存代表了一個自成源流的文化傳統。（吳春明 1993：167）

1994年，林釗先生發表〈福建新石器文化與青銅文化概述〉一文，認為大量發現的幾何印紋硬陶是福建青銅文化的特徵。印紋硬陶多與磨製石器共存，在少數地點印紋硬陶還與零星的青銅器或釉陶、原始瓷件出。印紋硬陶紋飾比較複雜，延續時間比較長，約始於商周，終於戰國。林氏並認為在閩江下游地區，經過發掘的印紋硬陶遺存有閩侯曇石山、白沙溪頭、庄邊山的上層、福州浮村遺址下層、福清東張遺址中上層以及黃土侖遺址。其中曇石山、庄邊山上層和東張中層的出土遺物中，開始出現受青銅文化影響的因素，如生產工具中仿銅的石戈、石矛和骨魚鏢，陶器輪製技術的進步，大量高火候硬質陶的出現，橙黃陶或灰陶拍印紋飾中出現雲雷紋和幾何花紋，印紋硬陶上繪出黑色或赭色的雲雷紋、網紋、平行斜線交錯紋等。而大型容器的出現，表明生產、生活水平較前有了提高。上述文化遺物所表露出來的種種進步跡象顯示，這些遺址可能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進入青銅文化時期的開端。（林釗 1994：427-428）

1994年栗建安先生對福建沿海地區的彩陶進行討論的結果，認為曇石山遺址上層等的彩陶，可能源於曇石山遺址中、下層，但是其間的環節尚未找到。（栗建安 1994）

1995年曇石山遺址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於1996年8月設立「曇石山文化博物館」，並結合1996年第8次發掘所保留下的文化層斷面、墓葬、灰坑等，進行現地展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閩侯縣委員會 1997：43-44）

1996年11月初至1997年1月底，進行曇石山遺址第8次發掘。由於前7次的發掘地點多位於遺址西南段，因此第8次選擇遺址的東北地段進行發掘，發掘總面積近800m<sup>2</sup>。曇石山遺址的前7次發掘資料說明了該遺址包含有上、中、下三個層位關係，反映了有持續發展關係的曇石山文化之三個階段的文化內涵。但在學術界仍有不同的看法，認為上述層位除中、下層比較確定外，上層因其破壞嚴重、

內涵複雜，其間又無明確的層位堆積予以說明，因此上層還難以構成一個確定的文化層位。而第8次發掘則彌補了這一點，它以明確的層位資料，證明以往的疊石山上層至少包含有兩種文化層位，即以橙黃陶為特徵的（即庄邊山上層類型），和以印紋硬陶為特色的（即黃土侖類型）兩種文化內涵。其中，在以橙黃陶為特徵的文化遺存中，也發現了幾座墓葬，出土了一些新的器類，不僅填補了以往歷次發掘的空白，同時為閩江下游地區陶器的考古編年研究，及重新認識這些遺存與疊石山文化的發展關係等，提供了一批嶄新的資料。另外有關黃土侖類型的文化遺存在疊石山遺址中的發現，在以往的發掘資料中，只有在擾亂層中有零星的發現，但第8次發掘卻有確定的層位，不僅在層位上證明了該遺存晚於以橙黃陶為特徵的文化遺存，同時在該遺存中還發現了兩個帶有祭祀意義的坑，一坑埋放一具完整的狗骨架；另一坑埋放原始瓷器，器盤上還擺放有禽類動物的骨頭，這對於探討黃土侖類型的社會性質也具有重要意義。（福建省博物館 1997：6-7）但是，有關疊石山遺址第8次發掘的成果，目前只能見到簡報。

浙江南部毗鄰福建北部，是浙江省最主要的中高山地帶。九〇年代中期，因為浙南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珊溪水庫的建設，地處飛雲江上游之水庫地區的文物調查、考古發掘也隨之展開。1997下半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發掘泰順縣的獅子崗和牛頭崗遺址，發現了以黑彩陶、著黑陶、印紋硬陶為特徵的文化遺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1999：1）

## （二）小結

根據上述的研究簡史可知，關於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的看法有以下兩個重要的轉變：

1. 一個重要的轉變是關於福建彩陶起源的看法，有從早期的強調疊石山、東張遺址等的彩陶，乃是華北仰韶文化彩陶傳至南方的一種變體這種「外來起源說」（如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 1959：111-112, 119, 122；呂榮芳 1959），到林釗先生（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 1961：672, 696）指出疊石山的彩紋繪法較粗糙，而且其彩紋基本上沿用印紋陶的紋樣，只能說是在疊石山手製印紋陶器的基礎上加上彩飾而成的作法，以及王振鏞先生（1981：66-67）的「疊石山中層的紅彩可能正是由下層的紅陶衣演化而來的」等強調「本土起源說」這種轉變。

## 2. 另外一個重要的轉變是彩陶所屬文化階段的論爭：

綜觀福建學者對壘石山文化與庄邊山上層類型之關係的看法，有從八〇年代之前的視為同一文化的先後發展階段，轉變到八〇年代以後主張兩者為性質完全不同的遺存之看法，而造成這種變化的最大原因不外是學者們對新的要素之強調。所謂新的要素，主要為庄邊山上層類型中出現了少見甚或幾乎不見於壘石山文化的大量印紋硬陶、著黑陶和彩陶等遺物。學者們多著眼於庄邊山上層類型中這些新的要素，進而強調庄邊山上層類型和壘石山文化之間的差異，並認為在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之下，兩者不應視為同一文化之先後發展階段。

但是就在愈來愈強烈地主張壘石山文化和庄邊山上層類型兩者為不同文化性質的主張中，最近針對兩者的彩陶進行研究的結果，卻又反過來指出兩者之間可能的先後傳承關係。如吳春明先生指出，庄邊山上層等的彩陶乃源於壘石山文化，在閩江下游地區可以看到彩陶文化發生、發展之一脈相承的軌跡（吳春明 1993）；栗建安先生認為壘石山遺址上層等所見的彩陶，可能源於壘石山遺址中、下層，但是其間的環節尚未找到（栗建安 1994）。

而這些爭議，因為壘石山遺址上層除了包含有庄邊山上層類型的要素外，並可見有其後的黃土侖類型，甚至更晚的原始瓷器等要素，使得壘石山遺址上層與中下層之關係的論爭，愈形複雜。因為，學者們在進行比較時，易於將壘石山遺址上層的所有遺存均當成同時期的文化要素，也造成所得出來的結論亦有待商榷。而且不論是將壘石山遺址三層同視為一個文化，或視為先後兩個不同的文化，學者們多僅憑藉一部分遺物進行討論，所以其結論常隨著學者所持的視點不同而變動，至今無法對兩者的關係獲得一致的看法。

## 三、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的源流

### （一）福建彩陶的分布狀況

根據筆者（郭素秋 2002）對福建彩陶進行檢討的結果，福建地區的彩陶主要出現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壘石山文化，和其後的庄邊山上層類型之中。其中壘石山文化的彩陶數量相當零星，主要分布在閩江下游的壘石山遺址中層、溪頭遺址下層、庄邊山遺址下層等；而其後的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則有較廣的分布範圍和較多量的發現。將壘石山文化和庄邊山上層類型之彩陶的分布狀況，以圖示之，可得圖一。

雖然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的分布範圍遍布福建地區，並零星擴及浙南、贛東、粵東等地區，但是就遺址數和彩陶量而言，則因地域而有相當大的差異。就目前的考古資料看來，閩江下游—東北部—浙南這個地區，不僅出土彩陶的遺址較多且密集，且彩陶在一遺址陶器總量上所佔的比例亦較高（圖一斜線部分），但是在這個地區以外的區域，則遺址數和彩陶數量驟減，單一遺址僅見有極少量甚或數片的彩陶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在壘石山文化或是其後的庄邊山上層類型，閩江下游地區均可見到彩陶的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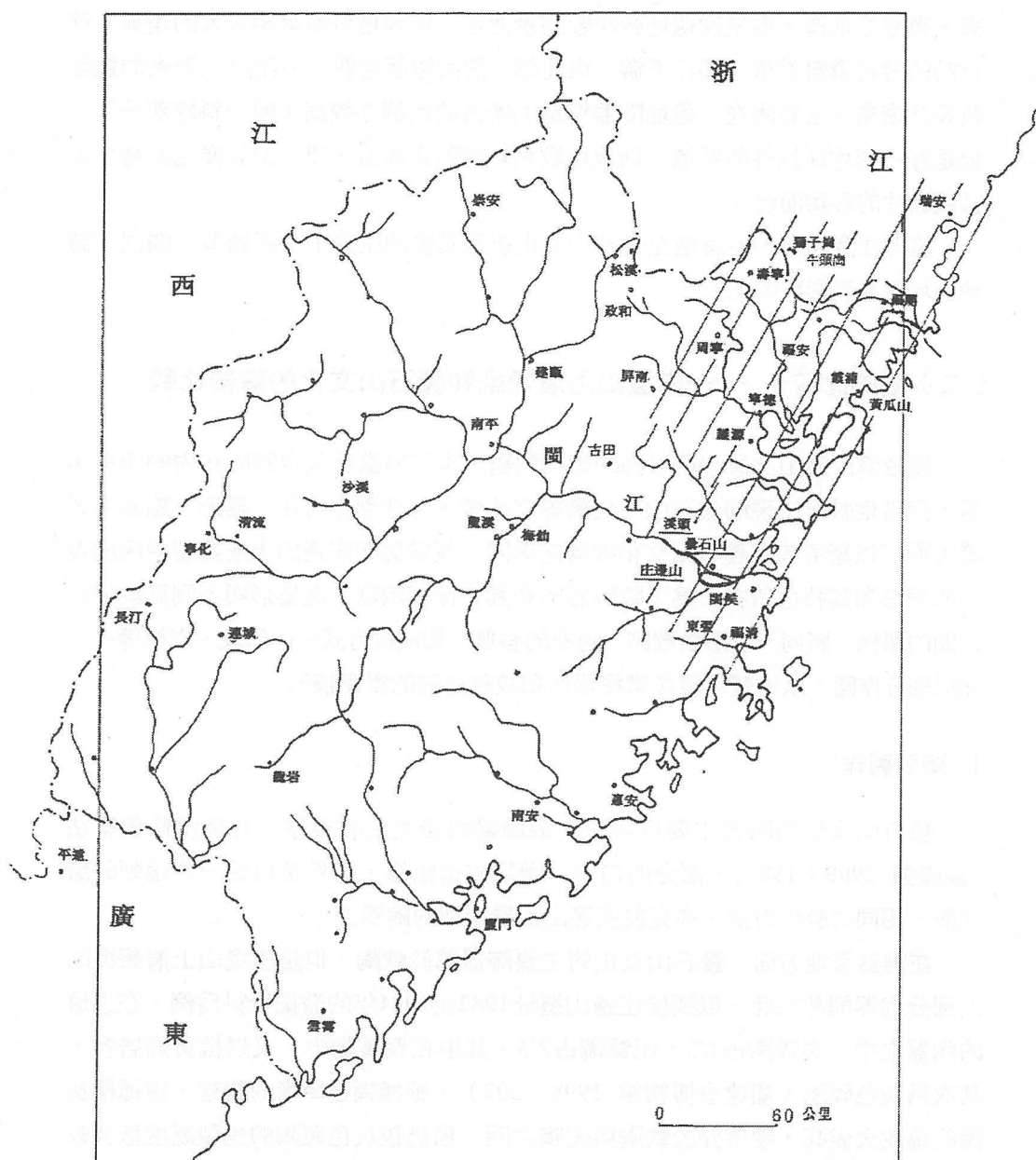
## （二）縱的比較——庄邊山上層類型和壘石山文化的陶器比較

為釐清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的起源問題，本節擬進行包含彩陶在內的所有陶器，與當地較早出現的壘石山文化陶器之比較，包括製作方法、器形、施彩方式等方面，以釐清其與壘石山文化陶器之異同，並掌握在庄邊山上層類型中所出現新的器形和其特色所在。為了瞭解彩陶和其它伴存陶器，在器形與不同施紋方法之間的關係，將同一器形依紋飾、色衣的有無，和施紋方式——印紋、彩紋等——加以細分作圖，以清楚呈現並掌握器形和紋飾之間的對應情形。

### 1. 陶器製作

壘石山文化的陶器主要為手製，根據鐘禮強先生的觀察，乃為泥條盤築法（鐘禮強 1999：158），部分的口沿、圈足經過輪修，另外並可見一些輪製的磨光陶。相同的製作方法，亦見於庄邊山上層類型的陶器上。

在陶器質地方面，壘石山文化的主要陶器屬於軟陶，但是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大部分陶器則非如此。以閩侯庄邊山遺址1982至1984年的發掘資料為例，在上層的陶器之中，夾砂陶占1/3，泥質陶占2/3。其中在泥質陶中，又以橙黃陶居多，其次為灰色硬陶（福建省博物館 1998：207）。根據福建學者的觀察，這種橙黃陶的燒成火候高，硬度介於軟陶與硬陶之間，但仍較灰色硬陶的燒製溫度低且較鬆軟（張其海、呂榮芳 1965：196；福建省博物館 1998：207）。換言之，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大部分陶器，其硬度有普遍增高的現象，而這種硬度的增加，應與燒製溫度的提高有直接關係。



圖一：福建曇石山文化和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分布圖

(遺址：曇石山文化遺址 斜線部分：庄邊山上層類型的遺址密集區)



庄邊山上層類型時期的彩陶，其胎質即為硬度較高的橙黃陶和灰色硬陶，可知這個時期的彩陶，與硬度較高的陶類有極高的重疊性。另外，根據張其海、呂榮芳兩位先生對曇石山遺址彩陶的觀察，本遺址的彩陶主要出土於上層，質地可分為兩種：即灰胎黑彩和橙黃胎醬色彩，其中灰胎者質堅而密，橙黃胎者疏鬆。（張其海、呂榮芳 1965：196），可知硬質較低的橙黃胎彩陶，其彩紋的顏色乃介於紅色和黑色之間；而硬度較高的灰胎彩陶，其彩紋的顏色則更深，常呈現黑色。

這種橙黃陶和灰色硬陶的胎質，在曇石山遺址的發掘報告中被歸類為印紋硬陶。<sup>1</sup> 有關印紋硬陶在曇石山文化和庄邊山上層類型中出土的狀況，根據曇石山遺址第6次發掘報告，在中層（屬曇石山文化）印紋硬陶僅占全部陶器總數的1.69%，而在上層的印紋硬陶則高達全部陶器的52.63%（福建省博物館 1976：97，107中層、上層陶片統計表），根據筆者換算的結果，其中橙黃陶約占上層全部陶器的20%。雖然曇石山遺址上層除了包括庄邊山上層類型的要素外，並可見其後的黃土侖類型或更晚的要素，但是根據黃土侖類型之代表遺址——黃土侖遺址——的灰色硬陶高達98%這點看來，可知橙黃陶到了黃土侖類型時期幾已不見。因此筆者認為，曇石山遺址上層橙黃陶的比例（約20%），基本上可以視為庄邊山上層類型的要素來考慮。在庄邊山上層類型的時期，包括彩陶在內之硬度較高陶器的大量燒造和使用，確實形成這個時期的一大特色。

## 2. 陶器器形與紋飾

本節擬以庄邊山遺址為主，並補充一些相關遺址的資料，來討論庄邊山上層類型和曇石山文化陶器器形的關係。根據1998年福建省博物館所發表的庄邊山遺址發掘報告，本遺址有下、上兩個文化層，其中下層屬於曇石山文化，而上層則為本文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命名層位。

### （1）陶器組成

根據圖二，可知在曇石山文化中占大多數的釜、圈足器等主流器形，在庄邊

<sup>1</sup> 但如前述，亦有學者（如陳存洗、陳龍 1983：21）認為以拍印繩紋、籃紋為主的橙黃陶，在陶質、火候、紋飾上與幾何印紋硬陶根本不同，不能視為同一類。而黃瓜山遺址1994年的發掘報告（福建省博物館 1994：10〔表一〕、26〔表二〕），也將橙黃陶與硬陶分開進行統計。

山上層類型仍可見到。以釜形器的胎質而言，疊石山文化以灰黃色夾砂陶為主，並有黃色泥質陶，以圓底器為主，紋飾則以細條印紋為主，並可見有在交叉條印紋之上再施紅色顏料者（圖二・10）。而庄邊山上層類型之相同器形的陶器，除了少量的黃色夾砂陶外，以燒製溫度較高的泥質橙黃陶為主，並可見部分為泥質灰陶者，除了圓底器以外並出現凹底器（圖二・2, 3），紋飾有條印紋、網格印紋、蓆印紋等；部分為素面，在一些拍印紋或素面之上可見塗有一層顏料者，以黑色顏料為多。（圖二・1-16）

以圖二所列的圈足器而言（圖二・20-36），下、上層之間則有相當大的共性，如兩者均以泥質灰色陶為主，器形差異不大，且多為素面，部分抹光，但上層見有少量灰色硬陶的質地和器表塗有黑色顏料者（圖二・26, 29），可知到了上層，有採用較進步的製陶技術製作傳統器形的現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圖二中所列的這類器形，不論是在下、上層均非彩陶的器形。

根據圖二，可知上層的黑（深）色彩陶的罐形器、陶紡輪的器形，可在下層的疊石山文化找到類緣。同時，在上層，與黑色彩陶的罐形器相同的器形，可見有帶條印紋、籃印紋、蕉葉印紋者等，且有在拍印紋飾上再塗上一層紅色、紅赭色或黑色顏料者，其中並包括多件燒製溫度較高的灰色印紋硬陶（圖二・42, 44, 46）。

另外，高領罐（圖二・58-66）、釜形器（圖二・67, 68），同時見於下層和上層，而在上層可見有印紋和在印紋上再施紅色或黑色顏料者。觀察上層高領罐的胎質，可發現在印紋之上再塗一層顏料的陶器胎質主要為橙黃陶，而僅帶拍印紋飾者則幾乎全為燒製溫度較高的灰色硬陶。換言之，隨著陶器燒製溫度的增加，於器表刷塗一層色衣的陶器數量有減少的趨勢。

圖三所列主要為不見於下層的疊石山文化，而為上層新出現的器形。這些器形主要為敞口器、鉢碗形器、器座和支腳等。不過，隨著日後新的考古資料之出現，這些所謂新的器形，有進行修正或增補之必要。

## （2）彩陶

根據圖二、三所進行的陶器編年比較，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器形可依是否能在疊石山文化中找到類緣，而分為以下兩大群：

1. 罐形器和陶紡輪：這類器形可在疊石山文化中找到類緣。而在庄邊山上層類型中，相同器形的陶器除了施有彩繪外，主要為帶有拍印紋，如條印紋、籃印

紋等，部分印紋上常再塗有紅赭衣或黑衣。如前所述，在庄邊山上層類型中，與下層主流器形相同的器形，雖然部分可見再塗上一層顏料者，但是除了罐形器（圖二・53-57）和陶紡輪（圖二・75）外，幾未見上有彩紋者。亦即，下層的主流器形雖仍部分存在於上層，但是除了罐形器和陶紡輪外，多未成為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的器形，意味著這個時期彩陶在陶器器形的選擇上有其局限性。

2. 敞口器、平底器、器座等：為在庄邊山上層類型中新出現的器形，不見於曇石山文化之中。特別是圖三・16、三・17的彩陶器形（敞口器），這種器形不僅見於同時期或稍晚的福建地區，後述的浙南獅子崗、牛頭崗遺址等亦見，意味著這種器形的出現已超出了較早的曇石山文化既有的分布範圍，而有較大的地域分布；這種敞口器並發展成繼庄邊山上層類型而興起之黃土侖類型的主流器形之一（圖五・9），並廣見於與黃土侖類型同時之其它鄰近地區的陶器組成中，唯黃土侖類型這個時期的敞口器以素面為主，偶見有刻劃符號或著上一層黑色顏料，但已不見施繪任何黑彩。

### （3）著黑陶

除了彩陶以外，於陶器器表之上再塗上一層顏料的著黑陶，是庄邊山上層類型中與彩陶伴存的一項非常重要的要素，而且著黑陶的數量更遠超過彩陶的數量。這種「著黑陶」的胎質亦與彩陶相同，以粗泥橙黃陶為主，並見少量的泥質灰色硬陶，所用的顏料成分根據學者的觀察（吳春明 1993：166），應與彩陶的顏料相同。這種著黑陶與彩陶最大的不同是，彩陶以圖案的方式呈現，而著黑陶則以色衣的方式表現。

有關著黑陶塗上顏料的方式可分成兩類：一類為在器表拍印籃紋、繩紋、方格紋、梯格紋、曲折紋等印紋之上再塗上一層紅色、赭色、黑色顏料，這類型的著黑陶在庄邊山上層類型的陶器中所占的比例相當高。另一類為直接施於素面的器表之上者（圖三・14），這類型的著黑陶在庄邊山上層類型中數量並不多，但是在年代稍晚的東張遺址中上層裏所見到的著黑陶，則均為這類的硬質素面陶（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1965：55〔表二〕）。

有關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和著黑陶之間的關係，從圖二、三所列著黑陶和彩陶的器形看來，可知兩者間有相當大的重疊。而根據張其海、呂榮芳兩位先生對曇石山遺址彩陶之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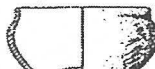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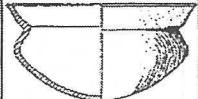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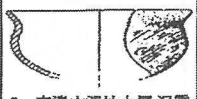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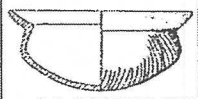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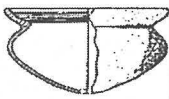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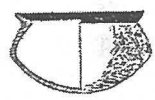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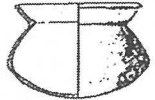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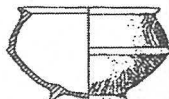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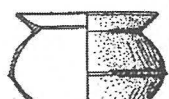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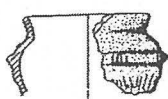
大部分的彩陶都有一層赭色陶衣，這種陶衣與幾何形印紋硬陶的赭色陶衣一樣。（張其海、呂榮芳 1965：195）

可知彩陶和著黑陶除了施紋方式的不同，即彩陶以彩繪，著黑陶則以拍印形成紋飾這點外，兩者不論是在陶器的質地、器形、裝飾的母題，甚至色衣的施加上，均呈現相當大的類似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著黑陶在器形變化和數量上均遠多於彩陶，甚至曇石山文化的部分主流器形亦僅見於著黑陶而未見於彩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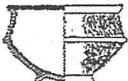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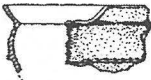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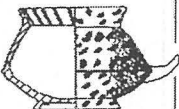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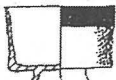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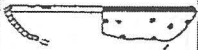

#### （4）彩紋與其它紋飾之比較

觀察圖二、三所揭示之庄邊山上層類型的陶器器形與施紋的關係，發現印紋硬陶、著黑陶和彩陶的器形相去不遠，彼此間有較大的重疊性。主要的施紋方式有拍印或施繪幾何形紋飾，並常可見到於拍印紋飾上再全面塗彩或施加彩紋的現象，另外並有少量於幾何形劃紋之上再施彩的現象（圖三・21）。但是如圖二、三和以下的圖四所示，雖然裝飾方法有拍印和施繪或刻劃等不同，但是三者所表現的圖案母題卻有相當大的類似性，而且在陶器器形方面亦有很大的重疊性。換言之，這個時期，拍印、施繪或刻劃方法，主要用來呈現幾何形紋樣這種類似母題，而這幾種施紋方法，常交互使用於同一器或同一類的器形上，並可見到兩種施紋方法重疊使用的現象，如可見到於印紋或劃紋之上再繪彩紋的例子。

爲了理解曇石山文化和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印紋、劃紋和彩紋之間的關係，筆者將兩者的紋飾比較如圖四。根據圖四，可知曇石山文化和庄邊山上層類型的繩印紋、條印紋、葉脈印紋、方格印紋和劃紋等紋飾，有相當大的類緣性；而將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印紋、劃紋與彩紋進行比較時，亦可以發現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紋和曇石山文化以來的這些印紋、劃紋的紋樣，和新出現於庄邊山上層類型的雲雷印紋等紋飾，有相當大的類似性。如彩紋常見的平行線列和人字形、V字形平行線列（圖四・22, 23, 26-29），與印紋中的條印紋、繩印紋、蕉葉印紋、籃印紋、蓆印紋（圖四・1-3, 5-10, 12, 13, 16, 17, 19），和劃紋（圖四・4, 18）有類似性；格子彩紋（圖四・30-32），與蓆印紋、方格印紋（圖四・3, 6, 11, 19-21）相似；而雲雷彩紋（圖四・24, 25），則與同爲庄邊山上層類型的雲雷狀印紋（圖四・14, 15）類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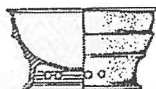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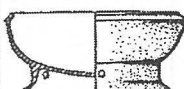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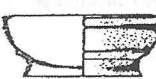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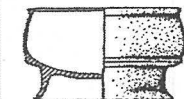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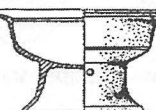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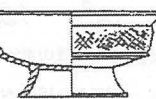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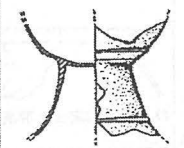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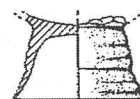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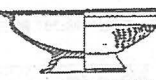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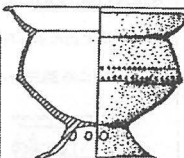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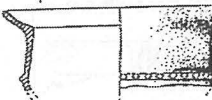
曇石山文化	庄邊山上層類型			
	素面或其它	印紋	色衣	彩紋
 1・庄邊山遺址下層,砂質灰黃色盆,H71:1,細條印紋,口徑 12.3cm,1998:191 圖二一-17		 2・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橙黃色盆,網格印紋,T60(3):21,口徑 13.2cm,1998:210 圖三二-14	 3・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灰色盆,T18(3):8,條印紋上施黑衣,口徑 10cm,1998:210 圖三二-5	
 4・庄邊山遺址下層,砂質灰黃色盆,H44:7,口徑 16.4cm,1998:183 圖一七-5			 5・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橙黃色盆,T60(3):35,淺亂網格印紋上施黑衣,口徑 18cm,1998:210 圖三二-23	
 6・庄邊山遺址下層,砂質灰黃色盆,M67:1,口徑 15.7cm,1998:183 圖一七-6		 8・庄邊山遺址上層,砂質黃色盆,H3:2,條印紋,口徑 29cm,1998:208 圖三一-17		
 7・庄邊山遺址下層,基,1990:55 附圖-2		 9・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灰色盆,H9:1,席印紋,口徑 23cm,1998:208 圖三一-18		
 10・庄邊山遺址下層,泥質黃色圈足罐,M9:2,條印紋,口部內外及圈足內外及突脊上施紅衣,口徑 12.2cm,1998:186 圖一八-22		 14・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黃色圈足罐,T8(3):21,條印紋,口徑 14.4cm,1998:210 圖三二-1	 15・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橙黃色,T38(3):35,條印紋,內口及器表施紅赭色衣,口徑 8cm,1998:210 圖三二-15	

圖二：曇石山文化與庄邊山上層類型陶器比較圖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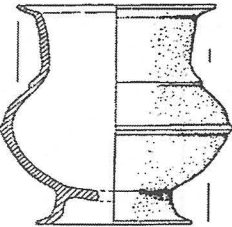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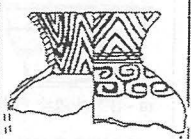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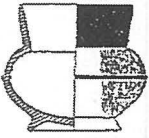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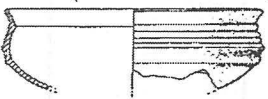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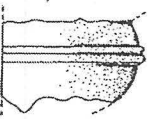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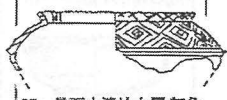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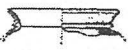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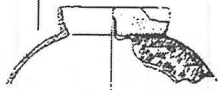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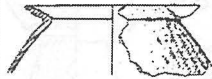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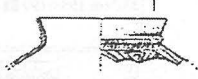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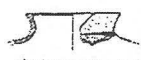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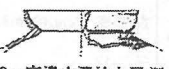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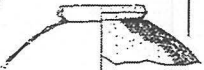




疊石山文化	庄邊山上層類型			
	素面或其它	印紋	色衣	彩紋
 11・庄邊山遺址下層， 墓葬，1990:55 附圖-3			 16・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 橙黃色盆，T178(3):48，黑 衣，殘高 7cm，1998:210 圖 三二-19	
 12・溪頭遺址下層，泥質 紅色盃，早期墓 M50:1， 條印紋上施紅色彩紋， 口徑 3.8cm，1984b:484 圖二五-11				
 13・疊石山遺址中層，細砂質 灰色盃，M10:1，繩印紋上施紅 色彩紋，彩紋已剝落，口徑 10cm，1976:93 圖一三-18				
 17・疊石山遺址中層， 王振鐸 1981:63 圖三-21				
 18・溪頭遺址下層，泥質灰 色豆，T203(5):4，紅彩，器表 灰白色衣，口徑 23cm， 1984b:472 圖一九-31				
 19・庄邊山遺址下層，墓 葬，1990:55 附圖-5				

圖二：疊石山文化與庄邊山上層類型陶器比較圖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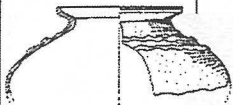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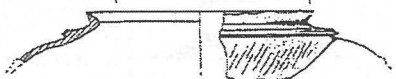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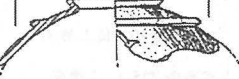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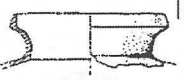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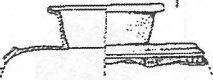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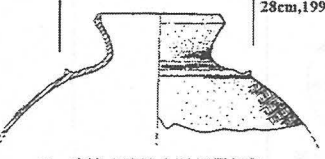


疊石山文化	庄邊山上層類型			
	素面或其它	印紋	色衣	彩紋
 <p>20・庄邊山遺址下層, 泥質灰黑色盤,M43:9, 口徑 19cm,1998:191 圖二一-14</p>	 <p>25・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灰色盆,H20:1,口徑 23cm,1998:210 圖三二-3</p>			
 <p>21・庄邊山遺址下層,泥質黑色盤,T61(4):30,口徑 17.4cm,1998:191 圖二一-15</p>	 <p>26・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灰色硬質盆,T62(3):60,口徑 15cm,1998:210 圖三二-4</p>			
 <p>22・庄邊山遺址下層,泥質灰色豆,H36:3,口徑 23.3cm,1998:190 圖二〇-7</p>	 <p>27・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灰色豆,H17:1,口徑 28cm,1998:210 圖三二-22</p>			
 <p>23・疊石山遺址中層,淡黃色盆,M6:8,飾網紋又抹平,口沿上施鮮豔紅彩,口徑 21.1cm,1976:101 圖一九-7</p>	 <p>28・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灰色硬質豆,T8(3):32,黑衣,殘高 12cm,1998:210 圖三二-12</p>		 <p>29・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灰色硬質豆,T20(3):11,黑衣,殘高 6cm,1998:210 圖三二-20</p>	
 <p>24・庄邊山遺址下層,1990:55 附圖</p>	 <p>33・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灰色圈足罐,H9:2,口徑 19.4cm,1998:210 圖三二-2</p>			
 <p>30・庄邊山遺址下層,砂質紅色盆,H68:1,紅衣,口徑 19cm,1998:191 圖二一-22</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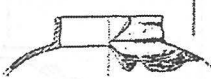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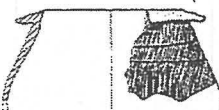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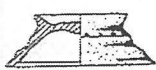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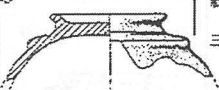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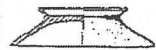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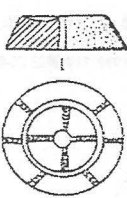

圖二：疊石山文化與庄邊山上層類型陶器比較圖之三

曇石山文化	庄邊山上層類型			
	素面或其它	印紋	色衣	彩紋
 31 · 庄邊山遺址下層,泥質灰色甕,M63:1, 磨光,口徑 14.7cm,1998:188 圖一九-18				 34 · 曇石山遺址上層,泥質 橙黃色罐,T115:1,黑彩,口 徑 14.4cm,1976 圖二五-9
 32 · 庄邊山遺址下 層,1990:55 附圖				
 35 · 庄邊山遺址下層,泥質 灰色盆,T38(4):39,口徑 22cm,1998:191 圖二-23	 36 · 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灰色盆,T7 (3):12,腹徑 38cm,1998:210 圖三二-27			 37 · 曇石山遺址上層,灰色 硬質盆,T118:2,口部外側 和器身黑彩,內口褐色衣, 口徑 29cm,1976 圖二五-8
 38 · 庄邊山遺址下層,砂質 黃色罐,H55:1,口徑 20cm,1998:186 圖一八-15		 42 · 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灰色 硬質短頸罐,T1(3):13,條印紋,口 徑 10cm,1998:208 圖三一-10	 47 · 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橙黃 色罐,T38(3),藍印紋上施紅衣, 口徑 24cm,1998:208 圖三一-3	 53 · 庄邊山遺址上層,泥 質橙黃色罐,T38(3):40,彩 紋,1998:208 圖三一-12
 39 · 庄邊山遺址下層,砂質 黃色,T8(4):29,條印紋,口徑 16cm,1998:191 圖二一-19	 43 · 庄邊山遺址上層,砂 質灰黃色罐,T302(3):7, 條印紋,口徑 13.2cm, 1998:208 圖三一-15	 48 · 庄邊山遺址上層,泥 質橙黃色罐,T38(3):38, 欄欄印紋上施紅衣,口徑 16cm,1998:208 圖三一-7	 54 · 庄邊山遺址上層,T38 (3),彩紋,1998:207 圖三〇-1	
 40 · 庄邊山遺址下層,泥質紅 色甕,H22:15,條印紋,口徑 14.4cm,1998:191 圖二一-21	 44 · 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 灰色硬質,T302(3):8,條印 紋,殘高 4cm,1998:208 圖 三一-16	 49 · 庄邊山遺址上層,細 砂質黃色罐,T8(3):28,蕉 葉印紋上施紅結衣,口徑 24cm,1998:208 圖三一-8	 55 · 庄邊山遺址上層,T60(3), 彩紋,1998:207 圖三〇-14	
			 56 · 庄邊山遺址上 層,T60(3),彩紋,方格印 紋,1998:207 圖三〇-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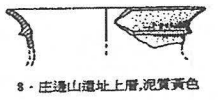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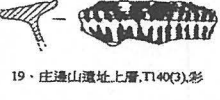
圖二：曇石山文化與庄邊山上層類型陶器比較圖之四

曇石山文化	庄邊山上層類型			
	素面或其它	印紋	色衣	彩紋
 41・庄邊山遺址下層,砂質紅色瓷,T179(4):50,篋印紋,口徑21cm,1998:191圖二一-20		 45・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橙黃色罐,T62(3):55,曲折印紋,口徑18.4cm,1998:208圖三一-6	 50・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橙黃色罐,T37(3):22,器表紅赭衣,殘高4cm,1998:208圖三一-9	 57・庄邊山遺址上層,T38(3),彩紋,1998:207圖三〇-11
		 46・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灰色硬質瓷,T37(3):25,淺條印紋,口徑31cm,1998:212圖三三-7		
			 51・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灰褐色罐,T37(3):21,蕉葉印紋上施黑衣,口徑17cm,1998:208圖三一-21	
			 52・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橙黃色瓷,T25(3):11,條印紋上施紅衣,口徑13.5cm,1998:212圖三三-3	
 58・庄邊山遺址下層,砂質灰黃色罐,T8(4):28,口徑13.5cm,1998:186圖一八-8		 60・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灰色硬質罐,T178(3):43,席印紋,口徑16cm,1998:208圖三一-13	 64・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橙黃色尊,T25(3):9,紅赭衣,口徑28cm,1998:210圖三二-8	
 59・庄邊山遺址下層,細砂質灰色近硬質罐,H22:4,細條印紋,口徑10.2cm,1998:186圖一八-27		 61・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灰色硬質罐,T62(3):59,槽欄印紋,口徑11cm,1998:208圖三一-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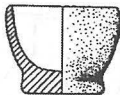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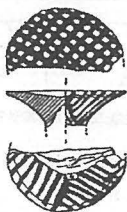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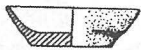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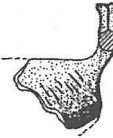
圖二：曇石山文化與庄邊山上層類型陶器比較圖之五

曇石山文化	庄邊山上層類型			
	素面或其它	印紋	色衣	彩紋
		 <p>62 · 庄邊山遺址上層,細砂質灰色硬質罐,T7(3):9,層欄印紋,口徑 10.7cm,1998:208 圖三一-1</p>	 <p>65 · 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橙黃色尊,T38(3):37,黑赭衣,口徑 26cm,1998:210 圖三二-10</p>	
		 <p>63 · 庄邊山遺址上層,細砂質灰色硬質罐,H1:3,曲折印紋,口徑 11.2cm,1998:208 圖三一-2</p>	 <p>66 · 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橙黃色罐,T18(3):9,條印紋上施紅衣,口徑 14cm,1998:208 圖三一-11</p>	
 <p>67 · 庄邊山遺址下層,砂質灰色罐,H26:5,細條印紋,口徑 12cm,1998:186 圖一八-5</p>		 <p>68 · 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灰色硬質,T25(3):8,細繩印紋,殘高 9.3cm,1998:208 圖三一-14</p>		
 <p>69 · 庄邊山遺址下層,砂質灰黃色器蓋,M60:1,口徑 12.5 cm,1998:191 圖二一-5</p>	 <p>71 · 庄邊山遺址上層,砂質黃色,T25(3):12,殘高 4.5cm,1998:212 圖三三-5</p>			
 <p>70 · 庄邊山遺址下層,砂質黃色器蓋,H22:9,口徑 19cm,1998:191 圖二一-6</p>	 <p>72 · 庄邊山遺址上層,砂質黃色,T2(3):10,口徑 19.8cm,1998:212 圖三三-2</p>			
 <p>73 · 曇石山遺址中層,M5:4,篋刻紋,1976:98 圖一七-2</p>	 <p>74 · 庄邊山遺址上層,T38(3):20,劃紋,直徑 3.5 cm,1998:214 圖三四-3</p>			 <p>75 · 曇石山遺址上層,T118:10,彩紋,1976:108 圖二四-4</p>

圖二：曇石山文化與庄邊山上層類型陶器比較圖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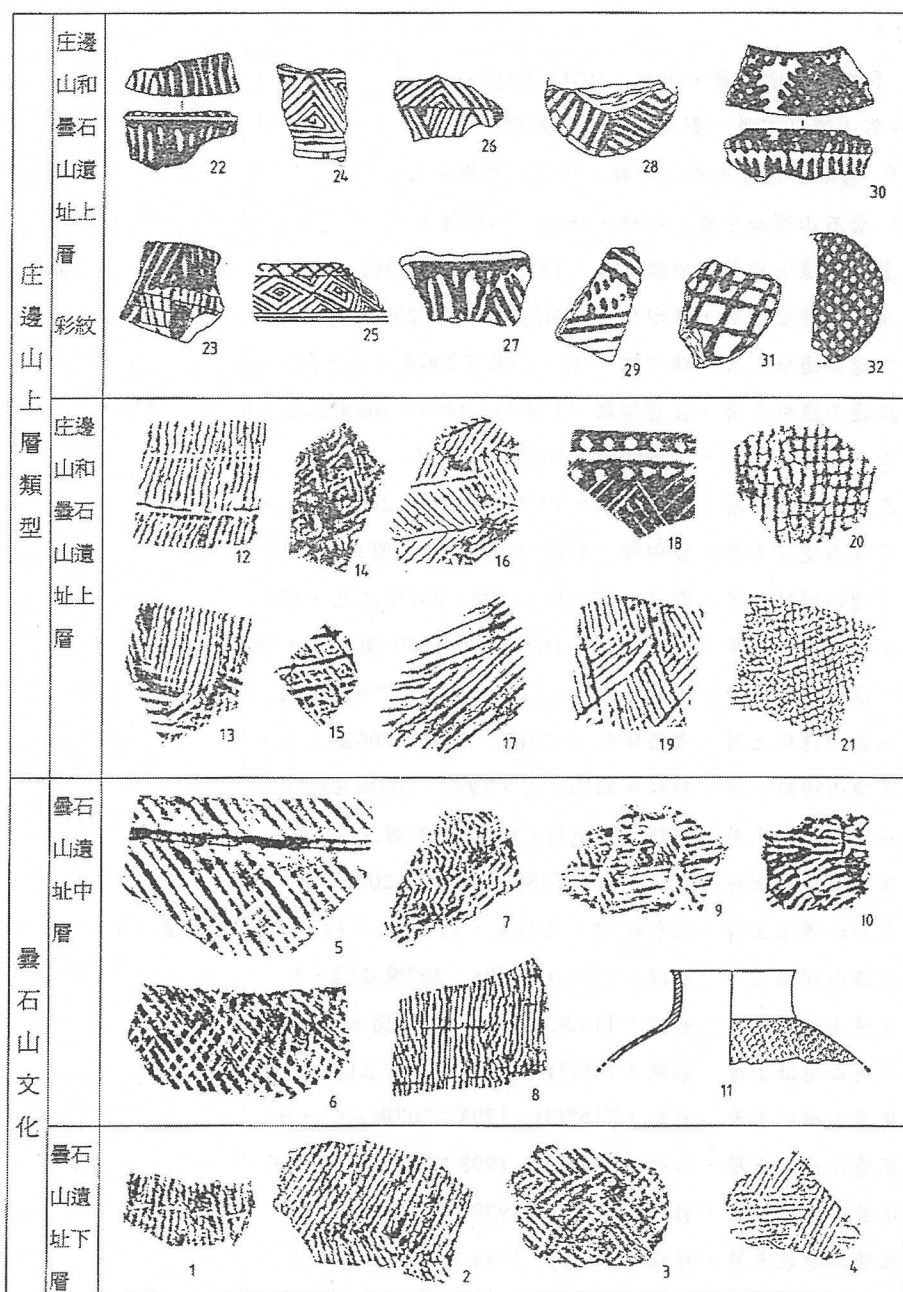
庄邊山上層類型			
素面或其它	印紋	色衣	彩紋
 1・庄邊山遺址上層,細砂質灰色硬質 盆,T180(3):10,口徑 22cm,1998:210 圖 三二-21	 6・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橙黃色 鉢,T7(3):8,條印紋,口徑 16cm,1998:210 圖三二-25	 8・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黃色 鉢,T140(3):35,黑衣,口徑 28cm,1998:210 圖三二-11	 16・庄邊山遺址上 層,T60(3),1998:207 圖三〇-4
 2・庄邊山遺址上層,砂質 黃色鉢,T301(3):14,殘高 4.6cm,1998:210 圖三二 -18	 7・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灰色硬質,T24(3):10, 繩印紋,1998:212 圖三三-14	 9・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橙黃色 盆,T37(3):24,紅赭衣,口徑 32cm,1998:210 圖三二-13	 17・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橙黃色 杯,T38(3):42,黑赭色彩紋,口徑 15cm,1998:212 圖三三-12
 3・庄邊山遺址上層,砂 質黃色盆,T25(3):10,口 徑 13cm,1998:210 圖三 二-16		 10・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灰色 盆,T140(3):36,繩網印紋上施黑赭 色衣,口徑 18cm,1998:210 圖三二 -24	 18・庄邊山遺址上層,M16 填土,彩 紋,1998:207 圖三〇-12
 4・庄邊山遺址上層,砂 質灰黃色支 腳,T140(3):39,殘高 10cm,1998:212 圖三三 -13		 11・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橙黃 色鉢,T60(3):43,繩網印紋上施 黑衣,殘高 6cm,1998:210 圖三 二-6	 19・庄邊山遺址上層,T140(3),彩 紋,1998:207 圖三〇-16
 5・庄邊山遺址上層, 泥質灰色器 座,T60(3):46,1998:212 圖三三-17		 12・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橙 黃色杯,T62(3):57,紅赭衣,口 徑 4.5cm,1998:212 圖三三-9	 20・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橙黃 色杯,T37(3):26,黑赭色彩紋,口 徑 6cm,1998:212 圖三三-8
			 21・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赤 色硬質,T61(3):45,刻劃斜線 三角紋上施黑色彩紋,底徑 8cm,1998:212 圖三三-6

圖三：庄邊山上層類型新出現陶器器形圖之一

庄邊山上層類型			
素面或其它	印紋	色衣	彩紋
		 <p>13・庄邊山遺址上層, 泥質橙黃色 杯,T38(3):41,黑絳衣,口 徑 4.2cm,1998:212 圖三 三-10</p>	 <p>22・庄邊山遺址上 層,T60(3),彩紋,1998:207 圖三〇-2</p>
		 <p>14・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 橙黃色胎,T62(3):56,黑衣, 口徑 10cm,1998:210 圖三</p>	 <p>23・庄邊山遺址上層, 泥質橙黃色胎 座,T162(3):12,黑絳 色彩紋,殘高 6cm,1998:212 圖三三 -19</p>
		 <p>15・庄邊山遺址上層,泥質 橙黃色胎,T138(3):9,條印 紋上施黑衣,殘高 9.7cm,1998:212 圖三三 -18</p>	

圖三：庄邊山上層類型新出現陶器器形圖之二





圖四：疊石山文化與庄邊山上層類型紋飾比較圖

說明：

- 1-3. 曇石山遺址下層，印紋，1976：92圖一一
4. 曇石山遺址下層，劃紋，1976：92圖一一
- 5-7, 9. 曇石山遺址中層，印紋，1976：98圖一六
- 8, 10. 曇石山遺址中層，印紋，1983：1080圖七
11. 曇石山遺址中層，方格印紋，T118，1976：99圖一八・22
12. 庄邊山遺址上層，條印紋，T24(3)，1998：206圖二九・1
13. 庄邊山遺址上層，繩印紋，H3，1998：206圖二九・5
14. 庄邊山遺址上層，雲雷印紋，T24(3)，1998：206圖二九・6
15. 曇石山遺址上層，雲雷印紋，1983：1082圖一一・1
16. 庄邊山遺址上層，蕉葉印紋，T31(3)，1998：206圖二九・9
17. 庄邊山遺址上層，籃印紋，T8(3)，1998：206圖二九・17
18. 庄邊山遺址上層，劃紋，T24(3)，1998：206圖二九・12
19. 庄邊山遺址上層，席印紋，T31(3)，1998：206圖二九・18
20. 庄邊山遺址上層，方格印紋，T37(3)，1998：206圖二九・19
21. 庄邊山遺址上層，方格印紋，T31(3)，1998：206圖二九・20
22. 庄邊山遺址上層，彩紋，M16填土，1998：207圖三〇・12
23. 庄邊山遺址上層，彩紋，T60(3)，1998：207圖三〇・6
24. 庄邊山遺址上層，雲雷彩紋，T38(3)，1998：207圖三〇・15
25. 曇石山遺址上層，灰色硬陶，黑彩紋，T118：2，1976：109圖二五・8
26. 庄邊山遺址上層，彩紋，T25(3)，1998：207圖三〇・3
27. 庄邊山遺址上層，彩紋，T162(3)，1998：207圖三〇・13
28. 庄邊山遺址上層，彩紋，T60(3)，1998：207圖三〇・2
29. 庄邊山遺址上層，彩紋，T162(3)，1998：207圖三〇・9
30. 庄邊山遺址上層，彩紋，T140(3)，1998：207圖三〇・16
31. 庄邊山遺址上層，彩紋，T38(3)，1998：207圖三〇・5
32. 庄邊山遺址上層，彩紋，T60(3)，1998：207圖三〇・2

值得注意的是，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紋圖案，雖與曇石山文化以來的印紋、劃紋紋樣有相當的類似性，但是卻與曇石山文化的彩紋圖案（如圖二・12, 13, 17-19, 32）有相當大的差異。兩者的彩陶除了彩紋的紋樣有明顯差異外，兩者的器形也有差異（圖七）。而且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紋主要為陶器未入燒前繪上，所以不易脫落（華東文物工作隊福建組等 1955：63），相對地，曇石山文化的紅彩則相當容易脫落（王振鏞 1981：67）。

### （5）小結

根據上述的比較，可知庄邊山上層類型的陶器器形、組成和紋飾，大多可以在曇石山文化中找到類緣。但是在這個時期，亦可見到以下幾點新的要素，如出現大量燒製溫度較高的陶器，而這些陶器在器形上亦呈現出新的特色，包括大型容器（如廣口尊、球腹罐、鉢等）和大敞口、折肩、圓凹底等作風；而陶器裝飾亦較以前豐富，拍印紋樣中並新出現雲雷印紋，更特別的是，以彩繪的方式來表現與印紋相同或相似的幾何形紋樣。

## （三）縱的比較二 ——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消失的背景

有關福建彩陶消失的背景，可透過庄邊山上層類型與其後黃土侖類型<sup>2</sup>的比較來進行探討。

黃土侖類型是繼庄邊山上層類型而興起的考古文化，它是早於戰國、秦漢時期閩越文化的考古文化。黃土侖類型不僅涵蓋了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分布範圍，且分布更廣，大體以閩江流域為中心，南起晉江，西達贛東，北至浙江南部，東臨海濱。（陳存洗 1989：93-94）

黃土侖類型的代表遺址為黃土侖遺址，黃土侖遺址位於閩侯縣鴻尾公社佛頭村南部的小丘。於黃土侖遺址的第三層出土大量的泥質灰色印紋硬陶，高達全部陶器的98%，以隨葬品占絕大多數，這些硬陶胎骨呈灰白色，質密，吸水性較弱。陶色因火候關係呈淺灰、深灰、黑灰等，其中以黑灰色火候最高，叩擊時發聲清脆。部分陶器口沿、頸部殘留褐色釉斑。陶器製作以輪製為主，少量器物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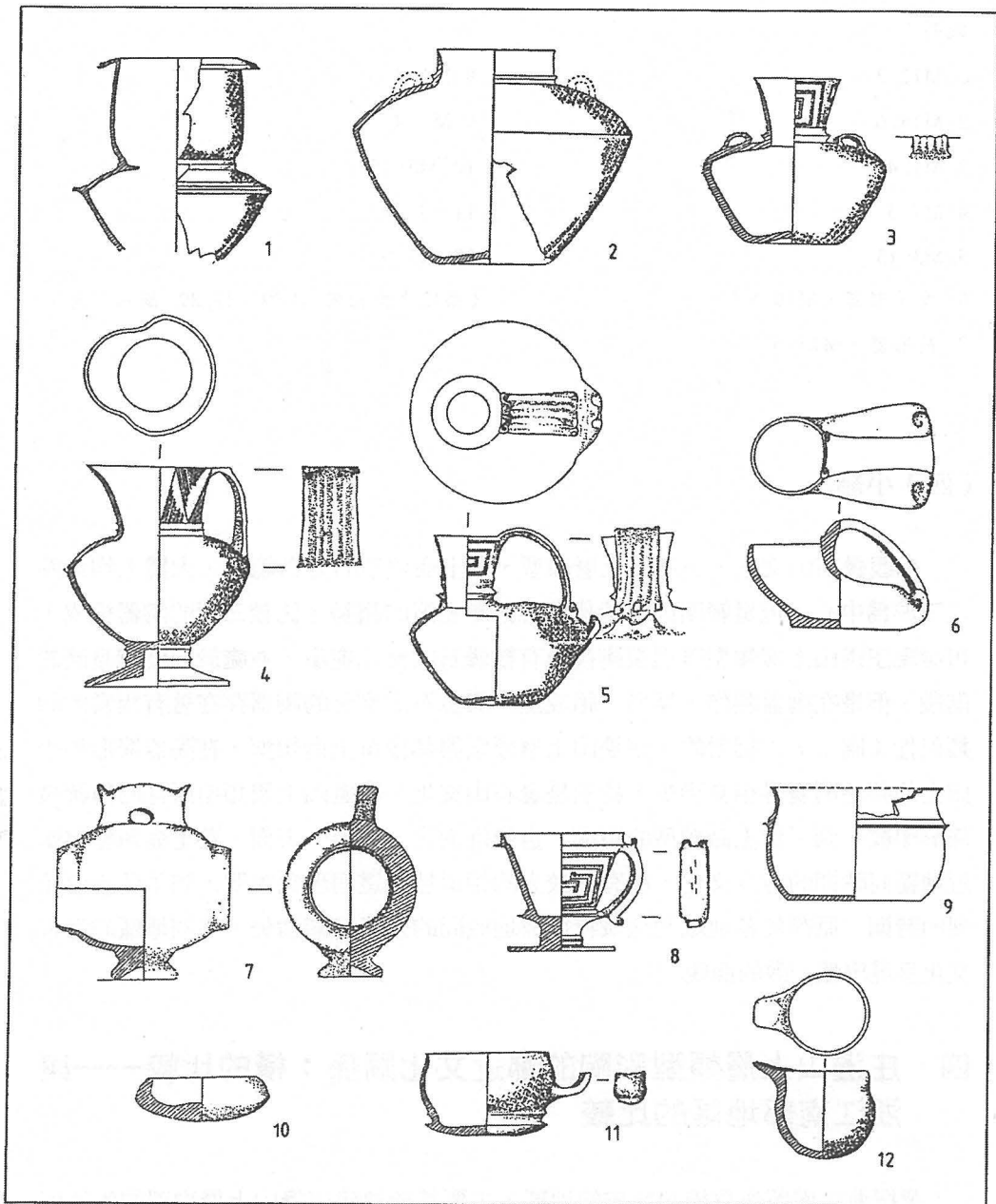
<sup>2</sup> 黃土侖類型亦有福建學者稱為「黃土侖文化」，本文為強調其地域特質，而以黃土侖類型稱之。

器物的個別部位用手製或模製。器種有豆、杯、罐、壺、尊、簋、甗、鉢、勺、盂、盤、釜、疊形器、虎子形器、鼓形器、紡輪、網墜等，其中圓餅狀座墊底是最顯著的特徵，不作圓餅狀座墊底的往往表現為淺凹底。紋飾採拍印、刻劃、錐刺、鏤孔、凸棱、出紐等手法，其中印紋有雷紋、方格紋；刻劃紋有回形紋、三角折線形、曲尺紋、平行斜線紋等。另有帶裝飾意味的S形、卷雲形、漩渦形等，泥條附加堆貼和羊、虎、夔龍等捏塑，並有少量刻劃符號，尤以細線刻劃回紋和簡化雲雷印紋為特色。（福建省博物館 1984c：23-25，31；牟永抗 1993：14）（圖五）

觀察圖五所列之黃土侖類型的陶器，雖然圖五·1的甗形器與曇石山文化（圖二·30）、庄邊山上層類型（圖二·31）的器形相似，而圖五·9亦與圖三·8、三·16等有一定的類似性，但是就整個陶器器形和組成看來，不可否認黃土侖類型確實與庄邊山上層類型的陶器有相當大的差異，而且在庄邊山上層類型見到之大量器表塗有一層黑色顏料的著黑陶和幾何形彩紋的彩陶，除了少量素面著黑陶外，幾乎未見於黃土侖類型。

但在另一方面，將黃土侖類型的陶器器形與周邊地區比較的結果，黃土侖類型與同時期的閩北白主段類型II期、馬嶺類型，閩西的部分青銅時代的陶器（林公務 1990b：79，81，圖八、九、十一）等卻有較大的類似性。而且根據牟永抗先生的看法，在黃土侖類型中，簡化雲雷紋與吳城三期的紋樣較為接近，帶把手的鬲形壺（包括虎子形器，圖五·5，6）又似為浙江高祭台類型鴨形壺的變種。高祭台類型由淺凹底發展到圓底階段，也是雲雷紋由開始出現並迅速盛行的時候，接著在高祭台類型出現一種圓底加貼泥條形成圈足的器底，圓餅狀座墊底很可能是條狀圈足強化後的表現，牟先生認為黃土侖類型可能是在這些因素的交叉作用下形成的（牟永抗 1993：13-14）。

可知從黃土侖類型的時期開始，原見於庄邊山上層類型的明顯地域特徵已大部分消失，在陶器表現上與同時期鄰近地區的陶器有著較大的共性。



圖五：福建黃土侖類型陶器組成

說明：

1. M12: 3

2. M15: 6

3. M1: 4

4. M7: 3

5. M3: 13

6. 虎子形器，M16: 6

7. 鼓形器，M17: 5

8. M6: 4

9. M8: 4

10. M5: 15

11. M5: 9

12. M3: 9

(福建省博物館 1989: 27, 29, 圖八、九)

#### (四) 小結

綜觀曇石山文化、庄邊山上層類型、黃土侖類型的分布範圍，大體上均以閩江下游為中心，但是範圍則有時代愈晚分布愈廣的趨勢。比較三者的陶器組成，可發現庄邊山上層類型雖然製陶技術有較曇石山文化進步，並處於向硬陶發展的階段，但是在陶器製作、器形、組成上，與曇石山文化的陶器存在著有相當大的類似性（圖二）；相對的，庄邊山上層類型與其後黃土侖類型，在陶器器形和組成上的共性則變得相當稀少，特別是曇石山文化、庄邊山上層類型所見的傳統幾何形印紋，到了黃土侖類型的時期，也幾近消失。在另一方面，黃土侖類型與鄰近地區同時期的考古文化，卻有著較大的相似性。這個現象說明，到了黃土侖類型的時期，原存於各地域的地域特徵與地域間的差異已漸消失，不同地區的考古文化呈現出較一致的面貌。

#### 四、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的鄰近文化關係：橫的比較——與浙江南部地區的比較

選擇浙江南部作為橫向比較的地區，主要基於福建庄邊山上層類型的陶器所透露出來的以下幾個特點：

1. 福建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的分布中心位於閩江下游和福建東北部地區
2. 出現大量的印紋硬陶



### 3. 於印紋硬陶上塗繪一層深色或黑色顏料的著黑陶器之多量出現

從上面幾點看來，在地理位置上與福建東北部最靠近，同樣出土大量的硬陶和部分繪有黑色彩紋或一層顏料的陶器，並且與福建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年代大致同時或稍晚之浙江南部的文化樣相，不得不加以重視。

浙江南部毗鄰福建北部，是浙江省最主要的中高山地帶。1997年下半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發掘了泰順縣司前鎮的獅子崗遺址和百丈鎮的牛頭崗遺址，發現了以黑彩陶、著黑陶、印紋陶為顯著特徵的文化遺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1999：1）由於這兩個遺址有較詳細的發掘資料，以下擬介紹獅子崗和牛頭崗這兩個遺址，以對這個地區的彩陶有進一步的瞭解。<sup>3</sup>

## （一）浙江南部的遺址概況與文化內涵

### 1. 浙江南部獅子崗遺址

獅子崗遺址位於泰順縣司前鎮的小丘，海拔160多公尺。1997年下半年的發掘，獅子崗遺址共出土陶片3,000多片。其中，泥質陶約占總數的1/3，可再分為粗泥陶和細泥陶，其中細泥陶稍多於粗泥陶。細泥陶燒成溫度大體高於粗泥陶，屬於硬陶。以下就這兩類陶進行敘述：

(1) 粗泥陶：燒成溫度較低，質鬆量輕，顏色為褐黃、褐灰色。器表以素面抹光為主，同時常形成不甚平行的旋紋，此乃手工製陶修抹器表而成。其次為拍印條紋和刷描黑彩，少量還有拍印或刻劃細繩紋、蓆紋、弦紋、網紋等；此外並有部分著黑陶和黑彩紋陶片。（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1999：3-4, 45）

(2) 細泥陶：胎質細膩緻密，燒成溫度較高，可分硬、中、軟三級，各級約各占1/3。細泥陶由於雜質含量少而能達到較高溫，但因燒造技術仍不成熟，容易出現欠燒或過燒的情況。陶色一般為淺灰色和青灰色，還有一些呈灰褐色者，其中淺灰色、青灰色陶器的硬度高於灰褐色陶。細泥陶器表處理第一步以素面抹光或拍印條紋兩種方法為主，輔以其它紋樣的拍印、壓印紋，這些紋樣有弦紋、旋紋、附加堆紋、弦紋與條紋的複合紋等；極大多數都有第

<sup>3</sup> 由於浙南地區的考古資料相當稀少，對現有考古資料的進一步檢討有待日後新資料的累積，因此在本節中以盡量呈現現有資料為主。

二步處理，即塗刷黑色泥釉，一些標本上有清楚的刷痕，施泥釉部位一般局限在器物的上半部，敞口器的沿內表也多施泥釉。器形以敞口為最大特徵，罐的沿面常下凹，平底也較多，還有一些凹圓底，器類多見罐、鉢、尊、甌等，製法以泥條盤築、拍打成形、分段分體拼接（口沿常見單體製作，於頸內側貼接）的手製法為主，尊、甌口部常見較深的多圈旋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1999：3-4）

獅子崗遺址的泥質陶器類有圓底內凹器、平底器、個別圈足器。凹圓底器形以罐為主，敞口、沿面內凹呈盤口、折腹、圓底內凹是陶罐普遍特徵。平底器主要是敞口折腹的盆、鉢和尊，喇叭狀大口甌形器也有少量發現。拍印紋樣以條印紋為主，幾何形印紋極少，僅見斜向編織紋一種；發現彩陶相對較多。在泥質陶中，以著黑陶和彩陶最具特色，以下就兩者進行敘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1999：45）

(1) 著黑陶：相當數量的粗泥素面陶器和拍印條紋的細泥陶器表上，均有一層相當稀薄的黑色胎膜，此即漸為學者所接受的稱呼——「泥釉」。釉色不發亮、釉層極薄是它區別於瓷器上的玻璃釉的表現特徵，而帶有這種黑色泥釉的陶器也已有一習稱——「著黑陶」。粗泥質著黑陶因胎質粗鬆，吸水性強，器表手感粗糙；細泥質著黑陶則手感細滑。著黑陶的著黑技術不高，厚薄濃淡不一，屬於著黑陶技術起步階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1999：3-4, 45）

(2) 彩陶：黑色彩陶共出土135片，約占全部陶片的4.5%。陶質多為褐黃、褐灰色之較低硬度的粗泥陶，細泥青灰色硬陶僅見3片。由於胎質鬆脆易碎，個體均很小，多見口沿和肩腹片，極少見器底和下腹片。器類以折沿罐為主，上彩部位主要在口沿內外、肩表和上腹部器表，且從上到下常見分幅施彩。口沿施彩情形有三種：沿內外表均有，此最多見；僅沿外表或內表，這兩種較少。根據施彩線條的粗細和末端鈍圓的形狀推測，施彩可能使用粗細不一的軟筆狀工具。黑彩紋樣以平行線紋或不同方向的斜線組合紋為主，還有少量斜線相交的斜方格紋、圓點紋、長點紋和叉點狀黑彩。紋樣的基本組合單位是粗細、長短、方向變化不一的條形黑彩。紋樣風格粗細交雜，嚴謹中又見隨意，單體略顯無序，整體比較有序。施彩原料和黑色顏料相同，只是作彩使用者較濃厚，色較深。彩紋以粗細不同、長短不一的線條組成圖案，斜線交錯組成的斜方格紋較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1999：4-5，

45) 這些施彩於口沿和上腹肩部的彩陶器，俯視可以見到完整的畫面，相當美觀，其機能是否與普通日用陶器有別，有待探討。

根據圖六，可知獅子崗遺址的黑色彩陶胎質（燒製溫度較低、呈褐黃色等）、器形（罐形器為主）和彩紋，與福建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有相當大的類似性，如圖六·1的罐形器亦可見於庄邊山遺址上層（圖二·18, 19），而獅子崗遺址的彩紋與福建東北部的黃瓜山遺址所見者有相當大的類似性，彩紋均較為工整。另一方面，獅子崗遺址的器表塗有一層黑色顏料的著黑陶（圖六·11, 12），其胎質以淺灰胎的硬陶為主，多施素面陶之上，且在類似的器形上可見有刻劃符號者（圖六·13）。與福建地區相較，獅子崗遺址這些著黑陶的胎質（灰色硬陶）、器形和刻劃符號，主要見於庄邊山上層類型之後的黃土侖類型或更晚的考古文化中，如福建光澤縣漢坪山古墓出土的著黑硬陶（圖六·21）等。由上可知，獅子崗遺址著黑陶的發展應較黑色彩陶的發展要晚。

## 2. 浙江南部牛頭崗遺址

牛頭崗遺址位於泰順縣百丈鎮的小丘，海拔120多公尺，周圍是崇山峻嶺，較獅子崗遺址更居於下游。1997年的試掘，出土大量的陶、石和1件青銅矛殘件。陶片出土近6,000片，其中在泥質陶部分，粗泥陶數量有所減少，細泥陶則高達陶片總數的2/3強。

(1) 粗泥陶：1,800多片，占30.4%，顏色褐紅。

(2) 細泥陶：4,000多片，占67.8%，多屬硬陶，多施拍印紋飾。其中高硬度的陶片占1,650多片，占硬陶41%，顏色青灰；中低硬陶近2,400片，占硬陶59%，顏色灰褐。胎表有黑色薄層的著黑陶數量不多，僅20多片，少數著黑陶表面器表有近似釉的光亮感。黑褐色彩陶僅見1片，為青灰色細泥質硬陶罐口沿，施交錯斜線組成的斜方格紋樣，值得注意的是，這件彩陶的黑彩已略帶有光澤。著黑陶和黑色彩繪陶兩者合起來不到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1999：17, 19, 45）

牛頭崗遺址的陶器製法以泥條盤築、拍打成型、分體（段）貼接為主的傳統手製法，比較普遍的弦痕（不甚平行的弦紋）是手工製作抹修的製作痕跡而非輪製痕。器形碩大，以卷沿、翻沿、斂口為主，少見淺凹圓底。器類主要有罐、瓮、鉢、豆、甗等，器表處理流行拍印幾何形紋，除了少量的條印紋外，還有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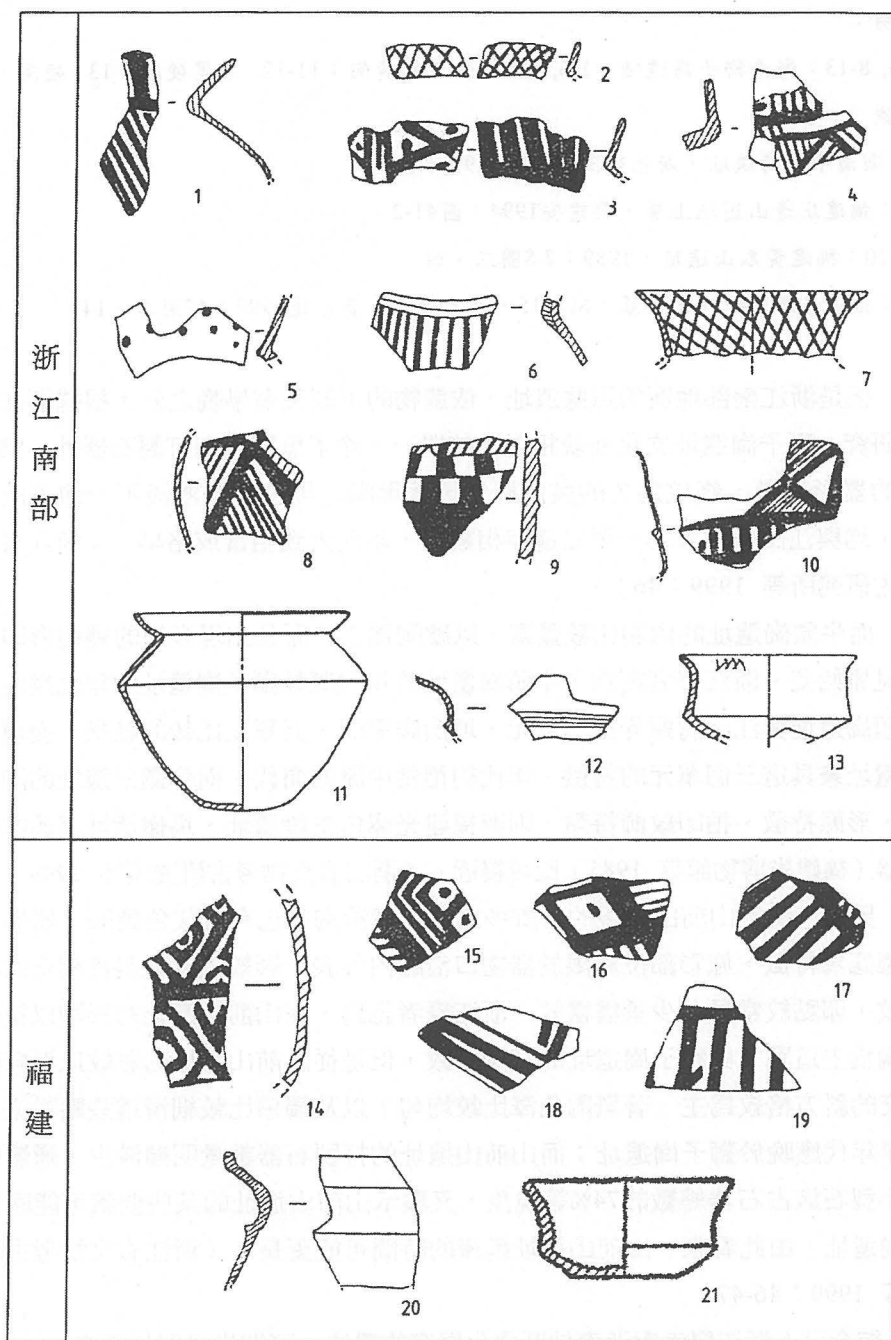
方格、菱格、斜向組合編織紋、斜向菱形雲雷紋、圓角雲雷紋、變體雲雷紋和曲折紋，並新出現同一陶器上分幅裝飾不同紋樣的複合紋飾作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1999：17, 19, 45）

牛頭崗遺址彩陶僅發現1片，為青灰色硬陶，器形是罐形器的口緣，彩紋是斜方格紋（圖五・17）。這件彩陶的器形與獅子崗遺址所見的素面著黑硬陶的器形相同，但是獅子崗遺址與牛頭崗遺址相同的彩紋，卻繪於較鬆軟的粗泥陶上（圖五・2）。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牛頭崗遺址的著黑陶雖然數量不多，但少數的黑色彩陶和著黑陶已發展出近似釉的光亮感。換言之，獅子崗遺址的多數彩陶和著黑陶仍無光亮，到了牛頭崗遺址的時期，往釉的發展已更進一步。

### 3. 浙江南部青銅時期相關考古文化層序

浙江學者指出，在浙江南部地區的甌江流域，遺址常分布在沿江大山前的小山頂，以瑞安縣飛雲江和永嘉縣上塘溪兩岸最為密集。常見一種拍印條紋的薄胎硬陶與幾何形印紋陶共存。這種薄胎硬陶，顏色為橙黃或灰白色的陶器，其胎料為泥質陶，只是顆粒較粗，也不及其它陶質純淨，製法以泥條法成型，其條印紋的器表上往往著染一層較光潔的黑色層（有的兩面塗成黑色），牟永抗稱之為「著黑陶」，並認為這種陶器可能與硬陶的起源有關。（牟永抗、毛兆廷 1981）上述的獅子崗和牛頭崗遺址亦應屬於這類的遺留。

浙江南部地區這種著黑陶常見的器形是一種高領廣肩的深腹罐，在一些碎片上可以見到拍印較淺的疏條紋。牟永抗先生認為，這種著黑陶與浙江各地都曾發現過的條紋鴨形壺和條紋深腹凹底罐，很可能存在著某種因襲關係。如馬橋文化的盛貯器中最有特色的是，硬質陶的高領罐和鴨形壺胎壁較薄、胎質稍硬於前期的泥質陶而不及印紋陶、陶色有淡黃色和灰色兩種、全部採用泥條盤築法成形、器表拍印斜向的條紋、外表常有黑色或暗紅色的塗層。其中鴨形壺拍印的條紋較深，亦較密集，往往著染成黑色或灰黑色；深腹罐在北部地區有的著染成紅色，有的並不著色而胎表呈現較深的橙紅色，或許是反映時代和區域的不同。（牟永抗 1990：10, 35-38）而類似浙江地區這種鴨形壺的器形，在福建地區主要見於黃土侖類型的時期（圖五・5），這也說明到了黃土侖類型的時期，浙江和福建地區的陶器呈現出較大的共性。



圖六：浙江南部與福建彩陶器形與彩紋比較圖

說明：

1-6, 8-13：浙南獅子崗遺址，1-6, 8-10. 粗泥褐黃陶；11-12. 著黑硬陶；13. 硬陶，刻劃符號

7：浙南牛頭崗遺址，灰色硬陶，1999：9圖1.6

14：福建庄邊山遺址上層，葉建安1994：圖41-2

15-20：福建黃瓜山遺址，1989：7-8圖三、四

21：福建光澤縣漢坪山古墓，M1：15，著黑硬陶，黃富蓮1990：47圖二·14

但是浙江南部地區的這些遺址，依遺物的不同又有早晚之分。根據浙江學者的研究，獅子崗遺址文化面貌相對比較單一，除了黑彩陶和打製石器外，圈底內凹的器形特徵、條紋爲主的裝飾風格、著黑陶之黑色顏料濃淡不一的不成熟特點，均與江山肩頭弄第一單元遺存相類似，年代大致相當或略早。（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1999：46）

而牛頭崗遺址的內涵比較豐富，以硬陶爲主，而且出現多樣的幾何形印紋，未見原始瓷。浙江學者認爲，牛頭崗遺址的年代應較獅子崗遺址的年代爲晚；將牛頭崗遺址與江山肩頭弄第三單元，地山崗第四、五單元比較的結果，發現牛頭崗遺址兼具這三個單元的特徵，年代約相當中原的商代。而牛頭崗遺址的陶器種類、形態特徵、拍印紋飾特點，則與福建光澤白主段遺址、馬嶺遺址墓葬的陪葬陶器（福建省博物館等 1985）比較接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1999：46）

另外，瑞安山前山發現的彩陶多爲粗泥橙黃陶，也有青灰色硬陶，器形以淺凹圈底爲特徵。施彩部位局限於器物口沿的內外表，彩紋主要是斜線相交的斜方格紋，卵點紋常見，少量雲雷紋。浙江學者認爲，在山前山遺址的彩陶以粗泥橙黃陶爲主這點，與獅子崗遺址的彩陶一致，但是從山前山遺址的彩紋以斜向直線相交的斜方格紋爲主、著黑陶色澤比較均勻，以及觸感比較細滑這些點看來，其最早年代應晚於獅子崗遺址；而山前山遺址的打製石器數量明顯減少，通體精磨的小型石鏃占石器總數的74%等現象，又顯示山前山遺址的某些要素可能晚於牛頭崗遺址。由此看來，山前山遺址延續的時間可能更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1999：46-47）

綜合以上浙江學者對浙南地區文化層序的看法，可初步整理如下表：



浙江南部青銅時期考古文化層序

年代	遺址或文化樣相
後	瑞安山前山
中	瑞安山前山、牛頭崗≡江山肩頭弄第三單元／地山崗第四、五單元
前	瑞安山前山
早	獅子崗≡江山肩頭弄第一單元

## (二) 黑色顏料的化學成分

有關著黑陶這層黑色顏料的成分，浙江學者曾進行過分析。1980年代初，在浙江江山縣南區古遺址和墓葬中又發現了相當數量的商前時期的著黑陶，經過對著黑陶上的黑色顏料進行化學成分分析的結果，學者們認為是一種泥釉的成分。浙江江山商前泥釉黑陶的泥釉無光、粗糙、吸水，其中雖含有較多玻璃態，但也含有甚多氣泡、殘留石英、大量磁鐵礦晶體和許多更微小的包裹物。黑色泥釉成分中RO（CaO+MgO）的含量很低，約為5%；助熔劑的總含量雖已較彩陶的白色塗層有所增高，但一般也不超過15%。因此這時的燒成溫度雖已提高到1,100℃左右，但尚不能把它熔燒成光亮、透明、不吸水的釉。李家治先生認為，泥釉黑陶的製造者可能已從彩陶製作的實踐中認識到，為了避免陶器的粗糙表面，可以在上面塗覆一層塗層，但由於使用Fe<sub>2</sub>O<sub>3</sub>含量較高的黏土作為塗層，也因為成分中多量Fe<sub>2</sub>O<sub>3</sub>和在氧化環境中燒成，黑色顏料中含有較多的玻璃相，並有赤鐵礦析出。而由於黑色顏料在成分上缺少助熔劑，特別是缺少CaO+MgO，在工藝上達不到應有的高溫，使它們在當時所能達到的燒成溫度下尚不能熔燒成透明、不吸水的釉，<sup>4</sup> 因此這層泥釉雖然具有釉的形式，但沒有達到釉的效果。李家治先生並認為，這層黑色泥釉是在彩陶的白色塗層或黑彩的工藝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sup>4</sup> 釉的成分除 SiO<sub>2</sub> 和 Al<sub>2</sub>O<sub>3</sub> 外，就是作為助熔劑引入釉中的 RO（CaO+MgO）、R<sub>2</sub>O（K<sub>2</sub>O+Na<sub>2</sub>O）和 Fe<sub>2</sub>O<sub>3</sub>。根據中國的情況，釉中的 RO 可能是由石灰石、草木灰或含鈣黏土引入；R<sub>2</sub>O 則可能由黏土引入；Fe<sub>2</sub>O<sub>3</sub> 和 TiO<sub>2</sub> 也可能由黏土引入，它們的引入既作助熔劑（10%以下），又作著色劑。隨著時代的進展，釉中助熔劑，特別是 RO 的含量發生明顯而有規律的變化。（李家治等 1985：17）

以後的原始瓷釉又是在黑色泥釉的工藝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將使用黑色泥釉的這個時期稱為「釉的孕育階段」。（李家治等 1985：17-18, 144）

至於有關福建庄邊山上層類型的著黑陶和彩紋的黑色顏料之詳細化學成分分析，目前並無相關的文獻資料可供參考，但有學者指出這些彩繪和黑衣的顏料，主要都是採取氧化鐵一類的礦物顏料粉末調成漿水施於器表燒成的（葉文程、林忠幹 2000：17）。

## 五、討論與結語

### （一）討論

#### 1. 壘石山文化的陶器組成 vs. 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

根據以上的檢討，從壘石山文化和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全部陶器進行編年的結果，可知兩者在陶器的製作、器形和施紋方法、紋樣等方面，有相當大的類似性。換言之，就文化的主體而言，壘石山文化和庄邊山上層類型之間明顯有先後傳承的關係。更特別的是，不論是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紋或印紋，其絕大多數的圖案均可在壘石山文化中找到源流，唯上層的較為規整而多變化（圖四）。

壘石山文化的主流器形雖仍部分存在於庄邊山上層類型之中，不過與壘石山文化有類緣性的除了罐形器和陶紡輪外，其它器形並未成為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的器形，意味著庄邊山上層類型時期彩陶在陶器器形的選擇上有其局限性，但此是否牽涉到不同器形間不同機能的限制，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另外，雖然壘石山文化的印紋圖案和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紋和印紋有類似性，但在庄邊山上層類型中，類似的圖案卻透過不同的施紋方法來呈現，除了之前的纏繩和條（簡單的繩）印紋、刻板印紋、劃紋等施紋方法仍繼續在使用外，並新出現以彩繪的方式表達類似圖案的施紋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庄邊山上層類型的這些印紋陶和彩陶圖案，配合新出現的雲雷印紋和雲雷彩紋，使紋飾的表現已具有初步的幾何形紋的特徵。而由於多種不同施紋方法的靈活運用，庄邊山上層類型的紋飾圖案，呈現出較純熟和較多樣化的面貌。

基本上，本文對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之起源探討所得到的結論，與林釗先生於1961年（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 1961：672, 696）

提出的看法大致相符，即：

彩紋的繪法較粗糙，彩紋基本上沿用印紋陶的花紋。曇石山彩陶的製作技術與華北彩陶完全不同，它只能說是在手製印紋陶器的基礎上加上彩飾的作法。

不過如上所述，當時所指涉的印紋陶印紋，並非僅限於現今所認知的以刻板所拍印出來的幾何形紋飾，而是包含以繩索纏拍所拍印出來者。

另外，對一些學者主張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是在幾何印紋硬陶的基礎上，沿襲印紋硬陶的紋飾而加以發展起來的」（張其海、呂榮芳 1965：193-195）這個看法，筆者則認為有待商榷。因為就出土層位而言，彩陶和幾何印紋硬陶為同時伴出的關係，雖然不排除兩者有彼此影響、採借的可能性，但是從彩陶和幾何印紋硬陶的質地、器形和紋飾等看來，筆者認為兩者的起源均應從較早之曇石山文化的陶器傳統中尋找。

## 2. 曇石山文化的彩陶 vs. 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

但是，單就曇石山文化和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而言，兩者的關係又是如何？根據圖七，可知兩者的彩陶器形和彩紋圖案有相當大的差別。其中在曇石山文化中，彩繪主要與繩印、條印紋或方格印紋等搭配出現，彩紋圖案也主要以滿彩、短線列彩紋和卵點彩紋為主，這個時期的彩陶有出土於墓葬之中和出土於一般文化層者。

而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器形除了罐形器、杯盆以外，並出現彩繪陶紡輪。這個時期的彩紋圖案表現變得較為繁複，除了短線列彩紋外，新出現的V、人字形、格子形的彩紋列，特別是雲雷彩紋，均成為這個時期常用的彩紋母題，這是不見於曇石山文化的彩陶的。這個時期的彩陶絕大多數出土於一般文化層之中。

可知就彩陶器形（與其機能有關）和彩紋圖案而言，曇石山文化的彩陶與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有相當大的差別，因此筆者並不認為曇石山文化的彩陶如吳春明先生（1993）所指稱，直接轉變為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根據前面討論的結果，筆者認為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不論在製作、器形或彩紋的圖案，均與曇石山文化中的印紋陶有相當大的類似性。換言之，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的出現，應與曇石山文化的印紋陶發展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但不可否認的，曇石山文化的部分彩陶傳統，確實為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

所承繼。如在印紋之上再施彩紋的施紋方式，已見於曇石山文化，到了庄邊山上層類型更廣為運用；而彩紋從曇石山文化的紅彩和易剝落的性質，到庄邊山上層類型的紅赭彩、黑彩的不易脫落，也可確信有先後彩紋工藝的發展過程存在。

其中有關在印紋之上再施彩紋這種施紋方式，筆者可以同意王振鏞先生的觀察：即曇石山遺址中層的簡單紅彩，極可能是從曇石山遺址下層的紅色色衣發展而來，兩者均為刷（繪）上去，且均容易剝落。（王振鏞 1981：66-67）筆者認為這也是為什麼曇石山文化的彩陶，多將彩繪施於繩或條印紋之上的主要原因，因為曇石山文化中常有於繩或條印紋等之上再施紅色色衣的傳統。曇石山文化陶器的這項特徵，到了庄邊山上層類型，乃被大量在各種印紋之上再施赭色或黑色色衣的著黑陶，和部分在印紋之上再施彩繪的彩陶加以承繼並發揚光大。

至於彩繪的發展進程方面，張其海、呂榮芳（1965：196）兩位先生指出：

曇石山遺址的彩陶（筆者按：指庄邊山上層類型）可分為灰胎黑彩和橙黃胎醬色彩兩種，其中灰胎者質堅而密，橙黃胎者疏鬆。

由此看來，就彩紋的顏色而言，有從曇石山文化軟質彩陶的紅彩，轉變為庄邊山上層類型之橙黃胎彩陶（介於軟陶和硬陶之間）的醬色彩（或稱赭紅彩），到灰胎彩陶（硬陶）的黑彩這樣的發展變化過程。而彩紋的牢固性也有從紅彩的易剝落，到黑彩的不易剝落這種性質的轉變，當然這也可能與燒後彩（陶器燒製後施彩，易剝落）或是燒前彩（不易剝落）這兩種不同的施彩順序有關。這種彩紋顏色的變化和附著性增加的原因，雖然仍有待日後進行這些顏料的化學成分分析和陶器的實驗考古等來加以解明，但就目前看來，筆者認為這種現象應與陶器工藝的進步有相當大的關聯。



圖七：疊石山文化與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比較圖

### 3. 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的周邊傳播與消失的背景

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的分布中心主要在閩江下游—東北部—浙南地區，但是即使在這個中心區裏，彩陶仍有地區性的差異。在閩江下游地區，彩陶和著黑陶為大量而同時伴出的關係，且陶質以較鬆軟的橙黃陶為主，灰色硬陶僅見少量，彩紋一般較為粗率、不規整；而在福建東北部黃瓜山遺址、浙南地區與彩陶伴出的陶器中，可發現已有黃土侖類型或更晚的要素（如一些相關器形，和真正的釉、刻劃符號等）與彩陶一起出土，而且彩陶的質地中除了橙黃陶外，燒製溫度較高的灰色硬陶之比例有增高的現象（福建省博物館 1994：10〔表一〕、26〔表二〕），加上黃瓜山、浙南遺址的彩紋較為規整等現象看來，筆者認為閩江下游的彩陶應略早於福建東北部和浙江南部地區的彩陶，並且極可能為彩陶的最早起源地。而這點應與庄邊山上層類型的文化傳統乃承繼曇石山文化而來有直接的關係。

浙江學者根據獅子崗遺址的遺物分析，認為黑彩陶的彩料和著黑陶的著色料基本相同，可能著黑技術的產生與黑彩技術有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1999：47）。筆者觀察獅子崗遺址黑色彩陶和著黑陶的胎質與器形，發現其中黑色彩陶的陶質多為粗泥褐黃陶，著黑陶則多以泥質灰色硬陶為主（圖五），就浙江南部地區陶器的發展進程看來，黑彩陶應比著黑陶年代略早。因此浙江南部地區，著黑陶受到黑彩陶影響的可能性是可以考慮的。

另外，東張遺址等的灰青色硬陶胎彩陶，其器表乃經過磨光後再加黑彩（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1965：60），這種不同的施彩方式之出現值得注意。筆者觀察這個時期的陶器已逐漸出現黃土侖類型的一些重要特徵，不僅在東張遺址，包括東北部和浙南地區的陶器，器表磨光的陶器數量增加而成為此時重要的特徵之一。這些現象意味著庄邊山上層類型晚期的彩陶也隨著陶器的發展潮流，而開始在灰色硬陶的磨光器表之上施加彩繪。這種新的發展也使得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逐漸地離曇石山文化傳統愈來愈遠。

在著黑陶方面，如第三部分檢討的結果，在庄邊山上層類型時期，帶有印紋之較鬆軟的橙黃陶其上再刷塗一層顏料的著黑陶比例相當高；但是發展愈後，部分灰色硬陶胎的陶器，於器表的印紋之上再刷塗一層顏料的現象逐漸少見，反而是直接將顏料刷塗於器表的現象有增加的趨勢。換言之，隨著高火候陶器（灰色硬陶）的增加，於器表的印紋之上再刷塗一層色衣的這種傳統作法逐漸減少，而



漸轉變為直接在素面器表上刷塗一層色衣的作法。值得注意的是，在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刷塗顏色於印紋之上的著黑陶消失之後，這種直接刷塗顏料在器表之上的著黑陶作法，仍為其後的黃土侖類型或同時期的考古文化所接受，而存在福建和浙南等地區的文化遺存之中，唯此時的著黑陶數量均為少量，已不復庄邊山上層類型時期的盛行。

有關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和大多數的著黑陶消失之因，可從以下幾個現象進行觀察。從黃土侖類型的黃土侖遺址中，灰色印紋硬陶占了98%以上，幾乎未見燒製溫度較低的橙黃陶，且著黑陶和彩陶的數量也隨之驟減或消失不見；加上黃土侖遺址等部分陶器口沿和頸部開始出現殘留褐色釉斑，以及浙南的牛頭崗遺址等少數彩陶和著黑陶有近似釉的光亮感等現象看來，到了黃土侖類型時期，不僅製陶技術更加進步，而且庄邊山上層類型時期所大量使用的黑（深）色顏料（分別形成彩陶和著黑陶）幾近消失。若福建這些黑色顏料與浙江的著黑陶成分相同，亦為一種「泥釉」的話，到了黃土侖類型時期這種黑色顏料的突然消失，可能與此時製陶技術的發達，以及真正的釉出現有關。此外，從黃土侖類型幾乎不見傳統的幾何形印紋這點看來，帶有強烈幾何形色彩的彩陶之消失，應與以幾何形紋飾為表徵的考古文化之衰微有相當大的關聯。

## （二）年代

有關曇石山文化的年代，有以下幾個參考年代：

1. 曇石山遺址中層的2件長牡蠣進行碳十四測年的結果，分別得到 $3,090 \pm 90\text{b.p.}$ 和 $3,005 \pm 90\text{b.p.}$ 兩個年代。（福建省博物館 1976：114-117）
2. 曇石山遺址中層獸骨的C14年代為 $3,600 \pm 70$ 、 $3,495 \pm 70\text{b.p.}$ （編號ZK-99-0，同層有印紋陶、灰黑陶、砂陶和石器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 1983：649）。
3. 溪頭遺址的陶片熱釋光測年平均值為 $4,240 \pm 190$ （晚期灰坑H32上層，Sb27）、 $4,310 \pm 190\text{b.p.}$ （晚期灰坑H3，Sb28）兩個年代。（福建省博物館 1984b：494, 499附錄一）。

參考上述幾個年代，林聿亮先生認為曇石山遺址的中下層年代，距今約4,000至3,500年左右（林聿亮 1990：92-93）；栗建安先生則認為曇石山遺址中層的年代應在距今4,000年左右。（栗建安 1994：340）

栗建安先生並參考黃土侖遺址的木炭測年年代（ $3,470 \pm 200 \text{ B.P.}$ ，校正年代），藉以推測曇石山上層的年代為距今4,000至3,500年左右，而庄邊山上層、東張中層以至黃瓜山遺址、福安及東北部沿海出土彩陶的各遺址、惠安大垵、廈門臨石寨山等遺址的年代，也大體與曇石山上層的年代相當。（栗建安 1994：340）

1998年發表的庄邊山遺址發掘報告書中，則推測曇石山文化的年代約在距今5,500至4,000年，主要分布在閩江下游及東部沿海一帶。而以庄邊山上層等為代表的遺存，較集中於福建東北部和閩江下游一帶；但是以幾何線條組成條繪圖案，並以此作為陶器紋飾特徵的文化因素，卻從浙江東南到閩南沿海、臺灣鳳鼻頭均見，其年代約在距今4,000至3,500年。（福建省博物館 1998：215-217）

另外，福建東北部的黃瓜山遺址發掘報告（福建省博物館 1994：36），在參考閩江下游地區的年代後，將黃瓜山遺址的下文化層（第5至7層，相當於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年代放在距今約4,000至3,500年，而上文化層（第3至4層，已出現部分黃土侖類型甚或更晚的要素）的年代放在距今約3,500至3,000年前後。

至於常被福建學者拿來與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進行比較的臺灣鳳鼻頭遺址，其彩陶主要出土於臺灣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貝塚層中，將與彩陶伴出的貝殼進行碳十四測年的結果，依年代早晚分別為 $3,310 \pm 80$  (Y-1580)、 $2,910 \pm 80$  (Y-1581)、 $2,900 \pm 120$  (Y-1649)、 $2,780 \pm 80$  (Y-1578)、 $2,670 \pm 60$  (Y-1648)、 $2,670 \pm 80$  (Y-1584)、 $2,440 \pm 100$  (Y-1577) b.p.。（Chang *et al.* 1969：50, 123；李光周 1983：56-57；郭素秋 2002, 2003）

參考以上幾個測年年代和各位學者的看法，加上筆者對曇石山文化和庄邊山上層類型的理解，筆者認為將曇石山文化的年代定在約距今5,500至4,000年，而庄邊山上層類型的主要年代定在4,000至3,500年前後是可以接受的。雖然閩江下游地區，在進入黃土侖類型的時期後即不見有彩陶的出現，但是在東北部黃瓜山遺址的上文化層（福建省博物館 1994）、浙南地區仍可見到彩陶與黃土侖類型的要素一同出土，甚至臺灣的鳳鼻頭遺址中，可以看到彩陶與刻劃符號施於同一件陶片上（Chang *et al.* 1969：100 Fig. 57-1）的現象，<sup>5</sup> 可見就廣義的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在周邊地區的持續年代而言，應較閩江下游地區的彩陶持續得更晚，筆者認為這些周邊地區的彩陶年代可以晚到距今3,000年甚或2,500年前後。

<sup>5</sup> 就福建地區而言，「刻劃符號」不見於庄邊山上層類型中，而是開始出現於其後的黃土侖類型或同時期的地方文化遺存之中，也多見於更晚的原始瓷器之上。

### （三）結語與日後的課題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包含彩陶和著黑陶在內之庄邊山上層類型的陶器，乃基於曇石山文化的陶器傳統，最早在閩江下游地區發展出來後，再向周邊擴散或傳播而成者。這也是為何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彩陶最早出現在閩江下游的原因。而福建東北部和浙南地區的彩陶和著黑陶，可能即受到閩江下游彩陶的影響發展而成。而從彩陶的紋飾與當地的幾何形印紋有相當大的類似性這點看來，這個時期的彩陶應是以幾何形紋飾為特徵之考古文化高度發展的產物。

有關庄邊山上層類型彩陶的消失之因，透過交叉比較的結果，筆者得到一個初步的推論：庄邊山上層類型大量著黑陶和彩陶出現的原因，與陶器技術的發展有極密切的關係，而這些刷繪在陶器上的黑色顏料使用，又隨著製陶技術的高度發展，和真正的釉出現之同時，而幾乎消失不見。如果庄邊山上層類型這種黑色顏料的成分與浙江地區著黑陶的成分相同，亦為一種泥釉<sup>6</sup>的話，其消失的原因應與真正的釉出現有關。

另外一個重要的現象是，幾何形彩陶的消失與幾何形印紋陶的衰微同時發生，此意味著彩陶的消失與以幾何形紋飾為表徵的考古文化之衰微，應有相當大的關聯，有關這個問題，將另文討論。而庄邊山上層類型中大量燒製溫度較高的陶器所意味之製陶技術的進步這點，是否直接源於曇石山文化，或是受到鄰近地區影響，則有待進一步研究。不過，從曇石山遺址中層（曇石山文化）出現與龍山文化類似的口小底大之袋狀陶窯，和陶器的燒成溫度達900-1,100℃（中國硅酸鹽學會 1982：47-50；鐘禮強 1999：159）看來，庄邊山上層類型製陶技術的進步，可能源於曇石山文化的製陶傳統。

有些學者認為，庄邊山上層類型雲雷印紋、雲雷彩紋等出現的原因，是受到青銅文化影響的結果，進而將這類遺存歸屬為青銅時代（陳存洗、陳龍 1983：21；林釗 1994：427-428）。但是筆者認為，這個問題仍需放在整個大陸東南地區甚或整個大陸地區的框架中來進行細密而全面的考量後才能確言，也必須重新面對一個從很早以前就被提及，而至今尚未解決的重要問題：「大陸東南地區的幾何形印紋陶如何出現和發展？」這個問題的解決為理解大陸東南地區如何結束

<sup>6</sup> 有關福建彩陶或著黑陶的化學成分，仍有待日後進行分析。

新石器時代而進入青銅時期的重要關鍵之一，也是日後必須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嘗試探討的重要課題。

（本文於民國九十二年二月二十日通過刊登）

## 後記

本文得以完成，必須感謝以下幾位先進：由於嚴文明、趙輝、大貫靜夫先生的介紹，筆者於1998年夏天到福建進行調查時，受到王振鏞先生相當大的照顧與幫助；東京大學的今村啓爾先生，在看過初稿後，鼓勵筆者對這個課題進行深入的研究；而臧振華、何傳坤、劉益昌、陳玉美、陳有貝諸位先生及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提供相當寶貴的意見，使筆者得以從不同的角度重新檢討文中的一些疏失。筆者在此欲向諸位先進致上衷心的謝意，但是，本文中所有文責，均將歸於筆者自身。

## 引用書目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閩侯縣委員會

- 1997 《閩侯文史資料》第七輯，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福建閩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閩侯縣委員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

- 1983 〈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報告（一〇）〉，《考古》1983.7：646-652, 658。

中國硅酸鹽學會

- 1982 〈我國新石器時代陶器的化學組成、燒成溫度和物理性能〉，《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頁47-50。

王振鏞

- 1981 〈試論福建貝丘遺址的文化類型〉，《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59-68。
- 1987 〈關於福建史前考古若干問題的初步分析〉，《福建文博》1987.2：9-13。

牟永抗、毛兆廷

- 1981 〈江山縣南區古遺址、墓葬調查試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學刊》1981：57-84。

牟永抗

- 1981a 〈浙江的印紋陶——試談印紋陶的特徵以及與瓷器的關係〉，《文物集刊》3，北京：文物出版社，頁261-269。
- 1981b 〈浙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初步認識〉，《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1-14。
- 1990 〈錢塘江以南的古文化及其相關問題〉，《福建文博》1990增刊：33-41。
- 1993 〈高祭台類型初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紀念1980-1990》，北京：科學出版社，頁7-15。

吳春明

- 1993 〈粵閩台沿海的彩陶及相關問題〉，《中國考古學會第九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161-174。
- 1999 《中國東南土著民族歷史與文化的考古學觀察》，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郭素秋

吳綿吉

- 1981 〈曇石山遺址的分期和年代〉，《文物集刊》3，北京：文物出版社，頁187-193。
- 1987 〈曇石山文化研究中的若干問題〉，《福建文博》1987.2：34-38。
- 1996 〈福建幾何印紋陶遺存與閩越族〉，《東南考古研究》第一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頁82-91。

呂榮芳

- 1959 〈中國東南區新石器文化特徵之一：印紋陶〉，《廈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59.2：45-56。

李光周

- 1983 《鵝鑾鼻國家公園考古調查報告》，交通部觀光局墾丁風景特定區管理處委託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報告。

李家治等（李家治、陳顯求、張福康、郭演儀、陳士萍）

- 1985 《中國古代陶瓷科學技術成就》，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林公務

- 1990a 〈黃瓜山遺址的發掘與認識〉，《福建文博》1990.1：25-28。
- 1990b 〈福建史前文化遺存概論〉，《福建文博》1990增刊：62-82。

林聿亮

- 1990 〈閩台彩陶文化略論〉，《福建文博》1990增刊：89-95。

林釗

- 1994 〈福建新石器文化與青銅文化概述〉，《考古》1994.5：421-434。

栗建安

- 1994 〈福建沿海地區的彩陶〉，《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339-34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溫州市文物處、泰順縣文博館）

- 1999 〈浙南飛雲江流域青銅時代文化遺存〉，孫國平、王海明、田正標、王同軍執筆，《東南考古研究》第二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頁1-51。

張其海、呂榮芳

- 1965 〈福建閩侯曇石山遺址陶器分析〉，《考古》1965.4：193-198。

郭素秋

- 2003 〈台灣新石器時代的彩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92年度第二次講論會論文稿，92.1.27。

陳存洗、陳龍

- 1983 〈閩侯曇石山遺址發掘新收穫〉，《福建文博》1983.1：6-29。



陳存洗

- 1989 〈汰溪摩崖石刻年代問題〉，《福建文博》1989.1/2：91-94。

陳龍

- 1994 〈閩江下游的青銅時代文化〉，《南方文物》1994.2：74-81。

曾凡、黃炳元

- 1959 〈閩東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考古》1959.11：633-634。

曾昭燏、尹煥章

- 1963 〈江蘇古代歷史上的兩個問題〉，南京博物館等合編，《江蘇省出土文物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1-36。

程道腴編著

- 1991 《陶瓷釉藥學》，臺北：財團法人徐氏基金會。

華東文物工作隊福建組等（華東文物工作隊福建組、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 1955 〈閩侯曇石山新石器時代遺址探掘報告〉，林釗執筆，《考古學報》第十冊，頁53-68。

黃富蓮

- 1990 〈光澤縣漢坪山古墓清理簡報〉，《福建文博》1990.2：47-48。

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

- 1959 〈福清縣東張鎮白多寺新石器時代遺址第11-39探方發掘報告〉，陳國強、呂榮芳、蔣炳釗、葉文程執筆，《廈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59.1：111-122。

楊式挺

- 1990 〈試論閩台粵先秦考古學文化關係〉，《福建文博》1990增刊：42-55。

葉文程、林忠幹

- 2000 《閩臺陶藝文化》，番薯藤文化叢書捌，臺北：幼獅文化公司。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

- 1961 〈閩侯曇石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至四次發掘簡報〉，林釗執筆，《考古》1961.12：669-672, 696。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廈門大學考古實習隊

- 1964 〈福建閩侯曇石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五次發掘簡報〉，呂榮芳、曾凡、葉文程執筆，《考古》1964.12：601-602, 618。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 1959 《福建省新石器時代遺址資料匯編》1959年油印本。

- 1965 〈福建福清東張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許清泉執筆，《考古》1965.2：49-61, 79。

郭素秋

福建省博物館、南平市博物館

1991 〈南平樟湖寶峰山遺址發掘報告〉，《福建文博》1991.1/2：44-56。

福建省博物館

1976 〈閩侯曇石山遺址第六次發掘報告〉，曾凡執筆，《考古學報》1976.1：83-120。

1980 〈福建閩侯白沙溪頭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一次發掘簡報〉，《考古》1980.4：289-295。

1983 〈福建閩侯縣曇石山遺址發掘新收穫〉，《考古》1983.12：1076-1084。

1984a 〈閩侯庄邊山遺址82-83年考古發掘簡況〉，《福建文博》1984.2：40-50。

1984b 〈閩侯溪頭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林公務、王振鏞、林聿亮執筆，《考古學報》1984.4：459-501。

1984c 〈福建閩侯黃土侖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4.4：23-37。

1989 〈霞浦黃瓜山遺址調查簡報〉，《福建文博》1989.1/2：5-10。

1994 〈福建霞浦黃瓜山遺址發掘報告〉，林公務執筆，《福建文博》1994.1：3-37。

1997 〈1996年福建考古的重要收穫・閩侯曇石山遺址第八次考古發掘的重要收穫〉，林公務執筆，《福建文博》1997.1：6-7。

1998 〈福建閩侯庄邊山遺址發掘報告〉，林公務執筆，《考古學報》1998.2：171-227。

福建省博物館等（福建省博物館、光澤縣文化局、文化館）

1985 〈福建省光澤縣古遺址古墓葬的調查和清理〉，林忠幹執筆，《考古》1985.12：1095-1108。

鐘禮強

1999 〈論福建沿海史前文化的經濟型態〉，《東南考古研究》第二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頁155-159。

郭素秋

2002 〈台灣及び福建の彩文土器について〉，《東南アジア考古學》22號：1-24。

Chang, et al.

1969 *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Yal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no. 7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 The Origin of “Zhuangbianshan Upper Stratum Type” in Fujia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outhern Zhejiang

Su-chiu Kuo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origin of the enormous amount of painted potteries and potteries with black slip of “Zhuangbianshan upper stratum type” in Fujian by conducting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cultural remains of this particular period. Diachronically, comparisons are made between potteries of this period and those of the Tanshishan Culture, and those of the Huangtulun Culture type, which prospered after the “Zhuangbianshan upper stratum type.” Synchronically, potteries of the “Zhuangbianshan upper stratum type” and those of southern Zhejiang have been compared. The author’s preliminary thought is that, through thorough examinations of different levels, the painted potteries of “Zhuangbianshan upper stratum type” were basically related to the Tanshishan Culture, hence an archaeological culture developed from the tradition of Tanshishan Culture. The use of the materials for painted potteries as well as the black pigment (perhaps a type of clay glaze) for painted potteries and potteries with slip indicated that it was an important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soft potteries to early porcelains appeared. As pottery techniques advanced and the real glaze emerged, painted potteries and potteries with black slip had disappeared.

**Keywords:** Zhuangbianshan upper stratum type, painted pottery, pottery with black slip, clay glaze, pottery-making technique